

春秋战国时期

儒法斗争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我们
史。但是
地位，是
古非今，

决不能割断历
一定的科学的
展，而不是颂
素。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广西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目 录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 五厂工人理论小组	(1)
“复礼”和“明法”	谢 卓	(13)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唐晓文	(24)
谈吴起的变法事业.....	胡井武	(35)
论商鞅的历史功绩.....	陕西师范大学 师 之	(42)
荀孟之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吉林大学 劲云戈	(53)
孟轲——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	田 力	(67)
韩非的思想是战国末期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79)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五厂工人理论小组

这是工人经过刻苦钻研写出的一篇分析儒法斗争的文章。

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地、普及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很需要这样的文章。

有人认为：“工人可以批判‘克己复礼’，但不懂得儒法斗争”。这篇文章就是对这种资产阶级偏见的有力的回答。

《光明日报》编者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总结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改造我们的学习》）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

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正确认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实质，对法家作出正确的评价，对儒家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今天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大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有力地批判林彪鼓吹尊儒反法，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进一步认清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阶级内 容、政治内容及其实质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开始于春秋末年。这个时候的社会历史发展，进入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反映在思想意识领域形成了两大根本对立的派别——儒家和法家。因此，儒家和法家的出现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儒家的祖师爷是孔老二，战国中期的孟轲是孔老二死后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什么孔老二这派叫儒家呢？因为古代给奴隶主办丧事的人叫“儒”，孔老二年轻时就干过这种事，当过吹鼓手，所以他创立的学说就叫儒学，坚持儒家观点的就叫儒家。

法家的先驱者是少正卯，他和孔老二是同时代的人。当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荀况、韩非等。法家是因其政治主张而得名的，他们反对儒家的“礼治”，主张实行法治，所以后人就称之为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

什么叫礼治呢？礼治就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主要内容包涵“三制一法”：一、分封制：在奴隶社会，土地和奴隶都归天子所有，天子又把它分给下一级的奴隶主贵族（即诸侯），诸侯又分给下一级的大夫，一级一级往下分，谁有了土地，谁就有了统治权力。二、世袭制：奴隶主贵族的权力和地位是世袭的，父亲死了，儿子继承他的地位，不论是天子还是诸侯，权力和财产永远归他的家族所有。三、等级制：奴隶社会人的地位一共分为六级：天子、诸侯、大夫，这三级是贵族；士，这一级是平民；庶人和仆隶，这两级是奴隶。四、一法：就是刑法。这种刑法是专门对付奴隶的，对奴隶主贵族则不适用，即所谓“刑不上大夫”。奴隶主可以任意胡作非为，却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

儒家主张礼治，就是主张恢复奴隶制的上层建筑。这是因为，到了春秋末期，也就是到了儒家和法家产生的时代，奴隶社会已经走向没落了。

春秋末期的社会情况怎样呢？为什么这时奴隶社会已经面临崩溃了呢？有两点原因：一、由于铁器的发展和使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却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生产力的改变必然引起社会的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代表进步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应运而生，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二、由于奴隶们起来反抗奴隶主，推动了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奴隶主残酷地镇压奴隶，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一匹马、一束丝就换五个奴隶。如果奴隶逃跑，抓回来就被活活锯掉一条腿，扔到荒野，悲惨地

死去。而奴隶主却过着极其腐化奢侈的生活，死了以后还把奴隶杀掉或活埋，作为殉葬品，有时一次就活埋几百个奴隶。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奴隶大量逃亡，或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当时的柳下跖带领九千起义奴隶，“横行天下”，把奴隶主贵族打得落花流水，就是最著名的例子。这时新兴地主阶级也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向奴隶主贵族夺权，垂死的奴隶制度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制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

儒家的代表孔老二，看到奴隶制即将灭亡，他心疼得象刀绞一样，四处奔走呼号“吾从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还叫嚷什么“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拚命主张“礼治”。孔老二说自己作梦都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礼”是多么心驰神往，对“复礼”又是多么迫不及待。

而儒家的对立面法家呢？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大力提倡变法，主张实行法治。什么叫法治呢？就是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来统治国家，建立和实行地主阶级的专政。

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他通“古今之变”，积极宣传革新思想，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在他周围集合了一批先进的社会力量，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纷纷赶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弄得孔老二的门庭“三盈三虚”，学生好几次都几乎跑光了。少正卯和孔老二唱对台戏，对孔老二搞复辟是个严重威胁。

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批评儒家的“礼乐”是“淫佚之征”，主张根据历史发展需要而立法。商鞅不仅从思想上批评了儒家，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废除奴隶

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这就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经济特权。他还打破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反动规定，宣布刑无等级，奴隶主犯了法也要治罪。当时秦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聚集几千奴隶主贵族反对变法。太子的老师犯法治不治罪呢？商鞅为了严明法令，扫除推行新法的障碍，毅然处罚了公子虔、公孙贾，一个被割了鼻子，一个脸上被刺了字。

荀况和韩非也都主张用地主阶级的法治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治”。荀况讲“法者，治之端也”。韩非认为“法治”的好处是“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是，即使是大官有了罪恶就得受刑；那怕是老百姓，干了好事，也应得赏。这样，就摧毁了奴隶社会的等级制，按功劳大小来论功行赏。荀况和韩非还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王公大夫的子孙如果不符合地主阶级的政治道德标准，就不能当官，贵族世家也得靠边站。反之，一般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弟，如果符合地主阶级的政治道德标准，就可以当官。韩非指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就是说要从基层和地方选拔能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人材。

总之，法家的法治主张严重地打击了奴隶制的分封制、世袭制、等级制和刑法，适应了当时封建制度的要求，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而儒家主张“礼治”，顽固地维护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它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是主张复旧、走回头路的。

（二）坚持“法先王”，还是坚持“法后王”？

“法”是学习效法的意思。儒家为了替守旧的“礼治”作辩护，提出“法先王”的口号，主张一切效法西周的典章

制度。在儒家看来，西周奴隶制社会就是最美好的社会。孔老二极力鼓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意思是，唐尧、虞舜、文王、武王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值得效法学习的；连一个酒杯的样子改了改，孔老二也要破口大骂。孟轲继承了孔老二这种反动倒退的历史观，宣扬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的谬论。他说“五霸”不如“三王”，现在的诸侯不如五霸，大夫又不如诸侯，认为这些人接二连三地破坏奴隶制，简直犯了大罪。孔孟鼓吹“法先王”，其实质就是要复辟奴隶制。

法家坚决反对儒家“法先王”的复辟倒退，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认为国家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对当前的政治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人。

韩非更强烈地反对孔孟“颂古非今”的法古思想，针锋相对地提出“法古必后于时”，就是说，效法古人必然落后于时代。又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治理措施）变”。就是说，时代不同，社会的事情也就不同；社会的事情不同，各种治理措施也就应该改变。

法家另一个杰出代表荀况，进一步倡导“法后王”，反对孟轲言必称“三代”。荀况辛辣地嘲笑孟轲之流不过是捏造历史的狂妄无知之徒。他指出，儒家鼓吹复古，那是“呼先王以欺愚者”，其目的在于“乱世”，也就是“乱”新兴地主阶级统治之“世”，颠覆地主阶级的专政。荀况的话，非常尖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孟轲主张的反动实质。荀况主张法后王的目的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应当时之变”，就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变革旧制度、巩固封建政权的需要。

由此可见，法家法后王的思想是主张变革与进步，主张实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的。法家的“法后王”观点具

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厚今薄古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战斗精神。

(三) 坚持“听天由命”，还是坚持“人定胜天”？

法家和儒家代表了不同的阶级，代表了不同的政治路线，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他们各有一条为自己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思想路线。

儒家为了维护奴隶制，不得不乞求老天爷作为精神支柱，极力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观”。儒家的代表孔老二鼓吹“天”是有意志的。他说君子有三畏，首先是“畏天命”；又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得罪了老天爷，就是祷告也不管事。他还给天增加了一层神秘主义的油彩，通过门徒们大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说，人们的生死祸福和贫富贵贱，统统是“天”决定的，是“命”支配的，人们只能听天由命，不能有所作为。

儒家宣扬“天命观”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奴隶主的统治是出自“上天”的意志，要人们服服帖帖地听从统治，不准触犯半点奴隶制的秩序。

法家对“天命”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荀况反对“天有意志”的说法，认为天就是自然界。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说自然界有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的乱与治与“天”没有什么关系。荀况还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说，与其把天想得很伟大而且敬仰它，不如通过养育万物来制服它；与其对天顺从而又歌颂它，不如征服自然界来利用它。荀况认为，人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让天地万物都为人服务，人是自然界的主人，

不是自然界的奴隶。

“天”是奴隶主贵族以及儒家学派用来威胁、恐吓、愚弄和奴役人民的主要神学工具。所以，对于“天”的看法，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它是直接和社会政治斗争相联系的。马克思指出：“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页）天子自称自己是“天”的化身或“天”的儿子，是代天行事的。因此，批判天，就是批判天子。批判天子，也就是批判奴隶制的总头目。法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关于天的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它砸碎了人们思想上的“天命”枷锁，使人们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

列宁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三百六十页）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在思想路线上的斗争，也同样证明了列宁的这个论断。儒家鼓吹“天命观”，反映了他们坚持奴隶主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法家批判“天命观”，主张人定胜天，就是坚持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的倾向和思想体系，从世界观上、理论上论证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从以上儒法斗争的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使我们清楚地看出：这场斗争，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建立封建制还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政治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既然是一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

争，就必然是你死我活的，异常尖锐激烈的。事实也正是这样，韩非曾经说过，当时的“智术能法之士”和“贵重之臣”之间存在着“不可两存之仇”。就是说，没落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儒家和法家之间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

当时的儒家虽然唱着“仁义”“德政”的高调，披着“仁爱”的虚伪面纱，但在迫害法家方面，他们一把撕下了遮羞布，凶狠残暴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被孔老二杀害，暴尸三天。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受到了车裂的酷刑。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儒法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儒家用反革命暴力镇压法家，法家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儒家，镇压反革命。最有名的就是“焚书坑儒”。秦始皇采取了法家的主张，烧掉孔孟之道的书籍，第二年又在咸阳坑了造谣惑众、犯有严重罪行的四百六十个反动儒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告一段落。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战胜儒家的根本标志，是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事实雄辩地说明：“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社会的高级形式必然要取代社会的低级形式，进步必然战胜保守，新生必然战胜腐朽，革命必然战胜反动，这是一条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哪些历

史经验和阶级斗争规律呢？我们的体会是：

（一）通过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我们可以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可以进一步认清儒家的代表孔老二搞倒退复辟的反动面目，从而更加认清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在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孔老二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一边，反对社会变革，打击新兴封建地主势力，颂古非今，梦想恢复西周奴隶制，把历史拉向倒退。孔老二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是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卫道士，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是厚古薄今的复辟狂。他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而是吃人的豺狼。他要复礼，就是要恢复奴隶主的“天堂”，把奴隶们重新推入“地狱”，妄图让反动、黑暗的奴隶社会永世长存，让受苦受难的奴隶世代当牛作马。孔老二这种反动思想是一切反动派搞复辟倒退的思想武器。

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尊儒反法，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同样是要开历史的倒车。他要“复礼”，就是要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把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推入“地狱”。这就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由此可见，尊儒反法与尊法反儒的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思想领域里两条路线的斗争。

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林彪以及国际上的帝、修、反，为了达到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拚命吹捧孔老二，鼓吹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他们的复辟活动搞得越

凶，对孔老二就捧得越高。因此，我们今天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对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的沉重打击，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生死存亡的斗争，是一场阶级大搏斗，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亿万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

（二）通过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批判孔孟之道的长期性，更加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反修防修和反复辟斗争的自觉性。

儒法斗争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斗了三百多年，这仅仅是斗争的开始。两千多年来，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代表着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开历史的倒车，就必然要尊孔。董仲舒、朱熹、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等就是这样。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都从孔老二那里取经学道。叛徒刘少奇亲自跑到曲阜“朝圣”，多次抛出鼓吹孔孟之道的黑《修养》，为推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林彪更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搜集孔孟之道的反动言论，东拼西凑，在阴暗的角落里狂热鼓吹，以此作为反动思想武器，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和历史上进步的社会力量要前进，要革命，就必须反孔。这充分证明只要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存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就不会结束。所以批

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需要反复进行的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务必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我们应该懂得，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有的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有的是剥削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斗争。尽管这样，这种斗争还是那样复杂、尖锐、激烈，有时这种斗争要反复进行多次才能取胜。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最后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斗争必然是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有可能成功。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一步一步地清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地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原载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复礼”和“明法”

谢 卓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奴隶制没落，封建制兴起，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的儒家，提出“克己复礼”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政治纲领；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的法家，提出“明法”作为他们主张革新、反对复辟的政治纲领。“复礼”和“明法”的激烈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一

孔丘所说的“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时期主要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宗法等级、分封、世袭等一整套奴隶制上层建筑。

奴隶制社会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分工、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的出现，由原始社会发展来的。奴隶主贵族从最高统治者——天子开始，按照他的家族血缘关系的尊卑亲疏，规定了各个等级间的继承和分封的各种制度，用以进行统治权力和财产的分配。集中反映在政治上，形成了从天子到诸侯以至卿大夫等宝塔式的等级，构成全国范围内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网。

这种宗法等级制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即井田制的基础之上的。天子掌握了全国的土地，根据地区的不同，划分为面积大小不等的耕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由他们强迫奴隶耕种。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天子手里，分封给各级贵族的“井田”的疆界是固定的，不能买卖，所以又叫做“公田”。在此之外，不能再去开垦土地，否则就是非法的。

从国家政治制度上说，宗法等级制度是和分封世袭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国和家（指奴隶主贵族的家族）不分，族权即政权，也就是所谓“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孟子·公孙丑下》）。各个等级之间的上下关系也都是固定了的，是父子相传，世袭的。所以又叫做“世卿世禄制”。这也就是孔丘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一整套名分等级制度。这种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宗法等级、分封、世袭等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根本制度，当时就叫做“礼制”。

宗法、分封、世袭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祭祀之礼成了很重要的礼。谁掌握了祭祀权，谁就掌握了继承权。这样一来，政权、族权又是和神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礼制”的实质，不过是奴隶主阶级把政权、族权、神权，当然还有夫权，这四条绳索紧紧地拧在一起，构成奴隶主阶级专政。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加强这个“礼制”，又相应地制订了各种各样的礼书、仪文。奴隶主贵族凭借这些东西进行统治，这就是他们宣扬的所谓“礼治”。

这个“礼”，是奴隶主贵族享有的特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他们的财产、权力、名分等级的标志。用孔丘的话来说，礼是民（按：应该读为奴隶主贵族）赖以

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礼，就无法对天地鬼神的祭祀礼节作出规定和限制，就无法维持君臣上下等级制度的固定不变，就无法分别宗法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尊卑亲疏。君子（贵族）应该特别地重视它，然后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统治百姓。（参见《礼记·哀公问》）

这个“礼”，对劳动人民来说，是一副血淋淋的枷锁。孔丘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所谓“易使”，就是要奴隶任凭奴隶主屠杀和压榨。奴隶主贵族为了举行祭祀天帝和祖先之礼，经常用奴隶充当祭牲，把人如同牛马猪狗一样杀死，叫做“人牺”。奴隶主贵族死了，为了举行葬礼，可以一次屠杀或活埋成十成百的奴隶，用作殉葬，叫做“人殉”。孔丘还直言不讳地说过：“有罪者惧，无罪者耻，民近礼矣。”（《尚书大传》）奴隶主贵族一手拿着杀人的凶器，一手拿着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枷锁——“礼”，疯狂地镇压奴隶的反抗斗争，对奴隶进行血腥的统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礼”加上“兵”，残酷地统治压榨奴隶大众，这就是殷周时期典型的奴隶主阶级专政，就是孔丘向往的“有道”的天下。

可是，孔丘面临的现实却是春秋晚期。这时，阶级斗争的狂飚巨浪正在猛烈地冲击着“礼治”的堤防和网罗。阶级斗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封建性的生产关系。随着井田制的崩坏，又促使了宗法等级、分封、世袭等制度的解体。先前赖以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礼制”的种种职能，几乎丧失殆尽，出现了孔丘所叹息的“礼坏乐

崩”的局面。奴隶主阶级专政即将破产，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的孔丘，清楚地看到了“礼”是奴隶制存亡之所系。他看到了，“礼”不但对于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是必要的，而且对于限制和压制新兴地主阶级也是必要的。《礼记·曲礼》说，如果丧失了礼，那么，道德仁义等就都要破产了，对人民无法控制，各种矛盾无法解决，名分等级制度无法维持，奴隶主贵族内部无法团结；就要弄得奴隶主贵族威风扫地，管理不了军队，执行不了刑罚，就连祭祀鬼神也搞不下去了。总之，“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记·曲礼上》）。所以，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季孙氏用了天子才能用的音乐舞蹈，孔丘就大加反对。孔丘又把“礼”比作堤防，他一再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防）者也。”（《礼记·坊记》）为了防止奴隶的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崛起，他认为需要把是非不清和细微不明之处都用“礼”来规定明白，区别清楚，不让人民有一丝一毫的越轨行动。他深知一旦堤防决了，旧礼失去了作用，就会给奴隶主阶级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所以，他说：“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

在孔丘看来，只要“复”了“礼”，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等级制度就可以重新得到维护，分封、世袭制度就可以重新得到巩固，井田制也就可以免遭破坏，奴隶主阶级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又可以牢牢地胶固在一起。实现了“复礼”，不仅可以使奴隶主贵族避免“坏国、丧家、亡人”的莫大灾难，而且可以达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

革命目的。这就是孔丘的一条反动政治路线。尽管当时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已经到了“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地步，孔丘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他当权做官也好，周游列国也好，设帐授徒也好，著书立说也好；在朝在野，在卫在鲁，每时每刻，都死抱住这条反动路线不放。

到了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风暴倾覆了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殊死斗争。这时候，儒家的代表者孟轲为了迷惑人，又把腐朽发霉的“礼治”，披上了“仁政”的外衣。他打着复古的旗号，“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他公然用自己的幻想把周代的井田制和世卿世禄制加以编造，歪曲和篡改历史，颂古非今，为复辟奴隶制制造反革命舆论。孟轲的行“仁政”就是“复礼”的别名。他主张：实行仁政必须从恢复井田制开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即直接从恢复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入手。只要井田制恢复了，那么宗法、分封、世卿世禄等全盘的复辟就不困难了。孔丘和孟轲的说法有所不同，路线却是一条。

这些事实说明，所谓孔孟之道，就是“克己复礼”之道，就是复辟之道。

二

儒家要“复礼”，法家要“明法”。吴起倡行“明法审令”（《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商鞅坚持“法必明”（《商君书·画策》）；韩非主张“明法制”（《韩非子·饰邪》）。法家把“明法”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明确地提出

要用“法”来代替“礼”，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制”来代替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礼制”。“明法制”就是反“礼制”。韩非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只有法令是最高贵和合适的，此外，不存在同法令并列和高于法令的东西，这就叫做“言无二贵，法不两适”。商鞅针对孔丘的“礼为政本”的谬论（“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提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民本，法也。”（《商君书·画策》）他还进一步指出：“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与孔丘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针锋相对。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韩非子·解老》）不是别的，正是奴隶制的“礼”，才是最不讲忠信的，才是一切乱子的罪魁祸首。

法家对“礼制”展开了全面批判。斗争的锋芒主要集中在这样三点上：一、用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即废除井田制；二、用依据官吏的功过进行任免和赏罚的制度代替世卿世禄制度，废除宗法等级制；三、用有利于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代替分裂割据的独立王国，废除分封制。

还在春秋后期，奴隶制的井田制就已经趋于崩溃了。法家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坚决主张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代替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战国初年，李悝〔晋〕在魏国实行了“尽地力”的改革，奖励垦辟土地，发展农业生产。

后来荀况也主张“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使“耕者乐田”（《荀子·富国》）。韩非也说过：“尽其地力，以多其积。”（《韩非子·五蠹》）都是要使封建的农业生产获得较快的发展。商鞅变法，规定“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这就从正式的法令上废除了井田制，破坏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

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阶级展开夺权斗争时，清楚地知道，不打倒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等级制度，他们自己就无法取得政治地位。因此，法家无情地揭露宗法等级制度的虚伪性，指出：君臣上下的关系，不是靠血缘关系维系的，而是靠赏罚维系的。韩非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因而法家更进一步喊出“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口号（《韩非子·有度》、《商君书·赏刑》），这对于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是一个有力的批判。荀况主张：贤能的人应该越级提拔，昏庸的人应该立即废黜；赏罚只能根据功罪，不能根据奴隶主贵族的家族亲疏来区别。商鞅更明确规定：刑法对奴隶主贵族和一般平民，都同样适用。“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同时，还规定了以军功行赏罚。从而用法家的“论功”取代了儒家的“正名”，奴隶主贵族世世代代把持政权的局面被推翻了。正如后来司马迁说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中

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制度。法家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分封制，主张实行郡县制。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项重大改革。当时，各国先后实行了郡县制，而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更是全面地实行了“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废除了分封制。然而，到了秦始皇统一以后，顽固的儒家复辟派还先后两次发起猖狂进攻，要求恢复分封制，反对实行郡县制。他们挑起了一场关系到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这一根本问题的大论战。坚定地站在法家立场的秦始皇和李斯，给予儒家复辟派以坚决的回击，使复辟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赢得了国家的统一。

在“明法”和“复礼”的斗争中，奴隶制的“礼制”以及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统统被法家批判得体无完肤。

儒家要“复礼”，就必然要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主张“复古”。法家要“明法”，主张顺应历史的潮流，“法与时转”（《韩非子·心度》），也叫做“师今”。因此，“明法”和“复礼”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师今”和“复古”的斗争。战国期间，儒家为了阴谋复辟，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和破坏法家的变法运动。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打着“复古”的旗号。当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候，他们就扬言吴起“变故（古）”，“易常”，将会酿成“大祸”。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他们又扬言：“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君书·更法》）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他们在阴谋复辟分封制时，还在制造“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反革命舆论。

把儒家的“复古”论调归结到一起，就叫做“法先王”。所谓“先王之道”，就是典型的殷周奴隶制社会的“礼制”。“法先王”和“克己复礼”是一路货。

与“法先王”针锋相对的就是法家荀况提出的“法后王”。荀况主张：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后王”能够汲取历史的经验，比“先王”自然要进步，所以应该以“后王”为法，而不应该称道“先王”。他的学生韩非说得更明白：历史的发展总是后来者居上，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决不应该因循守旧，必须有所创造革新（参看《韩非子·五蠹》）。商鞅坚决推行“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这样一条坚持革新、反对倒退的路线。韩非认为：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就加以肯定，这是愚蠢；不能肯定的东西就拿来作为依据，这是自欺欺人，“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秦始皇和李斯在打退复辟派阴谋恢复分封制的猖狂进攻后，严肃地宣布了“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民）”的罪状，同时还公布了“以古非今者族（杀）”的法令（《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师今”和“复古”的斗争中，法家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法令的公布，是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联系的。“焚书坑儒”集中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反动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两个方面：用进步的思想反对反动的思想；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反革命的活动。秦始皇“坑儒”，就是镇压那些鼓吹“克己复礼”，进行反革命复辟阴谋活动的儒生，即一群“以古非今”的复辟派的死党。象这样的反动家伙，商鞅曾经比作是六样虱子（《商君书·

新令》)，韩非曾经比作是五种蛀虫（《韩非子·五蠹》）；并且宣告与他们有“不可两存之仇”（《韩非子·孤愤》）。为了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对反动奴隶主阶级复辟派的死党就必须坚决镇压，毫不留情。用法家的语言来说，这叫做“除蠹（青杜，就是蛀虫）”。

儒家要“复礼”，法家要“明法”，“明法”就是反“复礼”；儒家要“复古”，法家要“师今”，“师今”就是反复古；儒家要复辟，法家要“除蠹”，“除蠹”就是反复辟。复礼，复古，复辟，这是儒家的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明法，师今，除蠹，这是法家的一条革新的政治路线。它们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如果儒家的这条反动路线得逞，反动奴隶主阶级就会重新上台，国家陷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就会延续下去，人民就会蒙受更大的痛苦。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两条路线之间进行了反复斗争，合乎历史潮流的法家的革新路线终于取得了胜利，封建制度越来越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越来越加强了。秦始皇正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巩固和发展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统一了中国，把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变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了他在历史上的功绩。

*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历史证明，一切失去了统治地位的、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都要搞复辟，开历史倒车，也都要鼓吹孔孟之道。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林彪

也不例外。他把“克己复礼”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迫不及待地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建立法西斯的林家王朝。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并且一步一步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凡是要“复礼”的，同时必然反法。林彪恶毒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把法家污蔑为“罚家”，借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发动广大群众，针锋相对地坚决反击。在深入批林批孔的同时，我们要对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从中汲取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败反动的儒家思想，进一步战胜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原载一九七四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唐晓文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左传》），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围绕这个问题，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曾经有过种种议论：有人对孔子杀少正卯的实质进行歪曲，也有人断言这件事是后人假造的。

事实到底怎样？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了解春秋末期儒、法斗争，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揭露尊孔反法思潮的反动实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有意义的。

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我们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春秋末期阶级斗争的状况，才能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

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期。由于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的发展，新兴封建势力的兴起，奴隶制正在崩溃，出现了被奴隶主阶级认为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的局面。要不要推翻奴

隶制的问题，不能不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的土地全归天子（王室）所有，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被分封和赏赐的土地只有享有权，没有所有权。后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突破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与它相适应的封建生产关系。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承认了新兴封建势力的经济地位。有些国家政权开始落在新兴封建势力手中。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面前，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想阻止社会历史的变革。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孔子猖狂攻击“税亩”制，说什么“初税亩，非礼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在孔子看来，按田亩征税，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是违反了“周礼”。他到处鼓吹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企图继续用奴隶主阶级的伦理道德和典章制度来束缚人们的行动。主张倒退，搞反革命复辟，梦想阻挡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反动本质。

当时法家先驱者们的主张和孔子的倒行逆施是相反对的。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在郑国有邓析，在晋国有范宣子等，他们主张实行同孔子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他们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孔子的“礼治”思想，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在鲁国，少正卯也是主张这条政治路线的。他和孔子

同时讲学，唱对台戏。孔子的学生几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造成“三盈三虚”的局面。可以看出，当时这场意识形态的反复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少正卯的思想，正是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孔子对少正卯的思想极端害怕和仇恨。所以，当孔子一朝掌权，就残酷镇压新兴的封建势力，杀了政敌少正卯。

少正卯的著述虽然没有遗留下来，但是，从《荀子》书中记载的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言论、行动和坚持“礼治”的孔子是根本对立的。当孔子的学生们对杀少正卯提出疑问时，孔子为自己辩护说：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荀子·宥坐》）。

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条“心达而险”

这是说：少正卯的思想（心）“达”、“险”。什么是“达”？“达”，在当时是“显达”、“仕进”的意思，就是要做官，要掌握政权。在奴隶主专制时代，只能由奴隶主贵族（所谓“君子”）掌握政权，不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新兴的封建地主和工商业自由民（所谓“小人”），要想起来掌握政权，就构成罪行。《论语·宪问》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后人注解道：“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谓达于财利，所以与君子反也。”奴隶主阶级要用“仁义”来维护奴隶主专政，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反对奴隶主生产关系的束缚，就讲“财利”。这是两

个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

什么是“险”？《韩非子·诡使篇》解释：“险”，就是“损人逐利”。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仁”。《礼记·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奴隶主贵族是根据天命得到统治权的，新兴地主阶级要起来倾覆奴隶制，自己掌握政权，这是冒险的侥幸行动。因此，“心达而险”，是说少正卯想要掌握政权，倾覆当时的奴隶制。这和孔子顽固地坚持奴隶制的反动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第二条“行辟而坚”

这是说：少正卯的行动是坚持“辟”的。什么是“辟”？“辟”字在当时有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实则是一致的。《方言》卷三说“辟”是“商人丑称”。奴隶主贵族看不起新兴的工商业自由民，骂他们是“辟”。孔子给少正卯加上这条罪状，可以看出少正卯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的。“辟”的第二重含义就是“刑”、“法”，当时称“刑辟”。原来，在奴隶制下，奴隶主贵族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生杀、掠夺，他们却将这叫作“礼治”。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要求发展自己的利益，希望定出法律来限制奴隶主的种种特权，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法治”。“礼治”和“法治”的斗争，就是当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孔子杀少正卯之前三年（公元五〇一年），郑国的邓析就因“行辟”，被奴隶主贵族杀害了。因此，“行辟而坚”是说少正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主张法治。这和孔子推行维护奴隶主“礼治”

的政治实践，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条“言伪而辩”

这是说：少正卯的言论是为“伪”辩护的。这个“伪”，并不是指一般的说假话。因为孔子主张：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利益，是允许而且提倡说假话的（《论语·子路》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古代“伪”字，可省写成“为”字。“为”字原来是指农业和手工业劳动，是和劳动人民直接相联的。所以，孔子删定的《诗经》中说的“伪言”，都是从“小人”、“思乱之民”（要想起来造反的奴隶）口中发出来的。“辩”是辩护，也有阶级性。《荀子·非相》中说：“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这就可以和第一条的解释相通了。奴隶主为“仁”辩解，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则为冒险倾覆奴隶主统治的言论辩解。因此，“言伪而辩”，是说少正卯的言论属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伪言”。这和孔子所鼓吹的“仁”是根本对立的。

第四条“记丑而博”

这是说：少正卯的著述（记录）中用大量材料（博）阐述“丑”的思想。这个“丑”字，古代与侏、匹、比字含义相同，原来是“讎”字，有相当、相等、相争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立、变革。因此，“记丑而博”是说少正卯在他的著述中，用大量材料，阐述变革的思想。这和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复古主义，是截然相反的。

第五条“顺非而泽”

这是说：少正卯是顺着“非”，并且把它加以润泽（加工、提高）。这个“非”和“诽”相通。“诽谤”就是反对、责备、批评。《春秋·谷梁传》说：“公田稼不善则非

民”。当时奴隶主认为他们的“公田”种得不好，就要责备奴隶。奴隶们要反对奴隶主的压迫剥削，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对当时奴隶制的政治不满意，也要起来批评反对，就叫作“庶人议政”，就是“非”。因此，“顺非而泽”是说少正卯支持那些批判、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并且加以润饰、提高。这和孔子指责“庶人议政”的态度是水火不相容的。

总之，少正卯反对“礼治”，主张“法治”，倡导革新，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这在奴隶主阶级看来，则是大逆不道，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非杀不可。因此，孔子叫嚷：少正卯的言行是在到处煽动群众（“居处足以聚徒成群”）；鼓吹邪说（“言谈足以饰邪营众”）；颠倒是非（“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如果让他这样搞下去，对奴隶主专制制度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因此，孔子便指斥少正卯为“乱政”的“小人之桀雄”，将其置于死地。

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少正卯和孔子之间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革新和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新兴封建势力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尖锐斗争的表现。

少正卯和孔子的斗争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序幕。孔子以为杀掉少正卯，就可以扼杀法家的兴起，就可以阻挡历史的发展。但是，与孔子的主观愿望相反，当时儒法斗争的结局，是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法家取得胜利，而那些“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的反动儒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中，受到严厉的惩处。“历史的巨

轮是拖不回来的”。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倒退到西周奴隶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叛徒陈伯达从托派的反动观点出发，否定中国有奴隶社会，从而把孔子和少正卯的斗争，完全歪曲为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个人之争，抹杀了这件事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质。这不仅表明了他对历史的无知，而且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的嘴脸。

“群而不党”是假，“党同伐异”是真

列宁指出：“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不例外。孔子自己曾标榜过什么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什么群而不党！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都根源于阶级斗争，都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什么超阶级、超党派的思潮和学派。孔子根本不是“群而不党”，而是“党同伐异”。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一贯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痛恨“邪说”，要讨伐异己，严厉惩处他的反对派（“远佞人”。《论语·卫灵公》）。他非常憎恶居于被统治地位而批判奴隶主统治的人，憎恶勇于斗争而无视“周礼”的人，憎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肯改变的人（“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在孔子眼中，少正卯正是这样一个“佞人”。孔子杀少正卯恰好戳穿了他所

标榜的“群而不党”完全是假的。

孔子还曾对季康子说过：“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看，真是满嘴仁义道德！但是，当孔子看到少正卯所主张的“法治”思想，危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时，他的“圣人”伪善的面貌，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事实证明，孔子是一个阴险凶狠的伪君子。

历史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作为屠杀异己的先例加以仿效。例如：西汉文帝时，博士们奉诏作《礼记·王制》，就开始将孔子杀少正卯的所谓五条罪状，抬高到法律的地位，作为镇压异己的根据。北洋军阀段祺瑞，针对当时群众革命运动，叫嚷“治国之道纲纪为先”，大谈孔子杀少正卯（《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八号）。不仅如此，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其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中，也以孔子杀少正卯为由头，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少正卯，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学说和主张”。这些事实确凿地说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总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独裁和专政。

春秋战国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发生的孔子杀少正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从来是不可调和的，总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当然，孔子杀少正卯和“焚书坑儒”，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专政。前者是反动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后者是刚刚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对搞反革命复辟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应该予

以赞扬和肯定；对孔子杀少正卯应加以声讨、批判。但是，在林彪、陈伯达等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手里，却完全颠倒了过来。他们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陈伯达一方面把这件事说成是在历史上“无从抹去”的“大罪恶”（《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杀少正卯看作只是个人之争，妄图抹杀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清楚地说明，林彪、陈伯达一伙叛徒、卖国贼是尊孔反法反动思潮的狂热鼓吹者。他们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实行孔孟之道的反革命两面派。

驳“伪造说”

有人说什么孔子杀少正卯是后人伪造的。这种看法就是历史上的“伪造说”。第一个提出这种论调的是南宋的朱熹。这个反动的地主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是《论语》、《左氏春秋》没有记载，子思、孟子没有说过，“乃独荀况言之”，“吾又安敢轻信其言”（《晦安先生朱文公集·舜典象刑说》）。朱熹这种只迷信孔孟而菲薄荀子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难道事件、人物的有无，只能以《论语》、《左氏春秋》有无记载，子思、孟子有没有说过作根据么？

我们知道，对待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先秦的法家和儒家代表人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法家的代表、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子，如实地记载了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实；而继承孔子衣钵、坚决维护孔子思想的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奉行儒家所谓“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道德原则，则故意回避了孔子杀少正卯这

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事实上，从战国末年至南宋初，在《礼记·王制》、《史记》、《说苑》、《论衡》、《汉书》、《尹文子》、《礼记·王制·疏》、《东坡志林》等书籍中，对孔子杀少正卯这一事件都有记载。这些书的作者立场不同，观点不完全一样，说法也互有出入，譬如有的认为是三月而杀，有的则认为是七日而杀。但是，他们都肯定少正卯是实有其人，孔子杀少正卯是实有其事。其中，司马迁的《史记》是被称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说苑》的作者刘向也被评价为“博极群书”。汉代的王充，是一个反对因袭旧说，坚持独立思考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论衡》一书中，对《荀子·宥坐》篇所载孔子杀少正卯，既没有揭其“书虚”，也没有斥其“言妄”，而是把它看作信史。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提供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新史料。直到这件事情发生一千七百年以后，朱熹为了尊孔反法，才炮制出伪造说，来美化孔子，掩盖孔子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本人对他抹杀史实的作法也是忐忑不安的。他晚年在《论语集注·序说》中也不得不说孔子“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但是在朱熹以后，有些人又出于阶级偏见，宣扬朱熹的“伪造说”，才使这种论调得以泛滥。这难道是尊重史料、尊重历史事实吗？

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吼声中，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也曾被作为专制丑剧，受到有力的批判。当时，连自命“尊圣子”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杀少正卯“此实孔氏之极大污点矣。”（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五四运动后，一些尊孔的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又特

意把朱熹的伪造说加以发挥，千方百计地掩盖孔子的“污点”。国民党御用文人钱穆就叫嚣什么《荀子·宥坐》篇记载的孔子杀少正卯是“虚造”的。也有人跟着叫喊，这件事“不可靠”。他们这样干的目的，是妄图把已经威信扫地的孔子偶像重新树立起来。这实质上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反动。

应当看到，有关中国历史的史料，都是经过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者，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和阶级偏见，加以删定或篡改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些史料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重新进行整理和评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盲目地跟着剥削阶级文人学者跑。

*

*

*

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件，反映了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势力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说明了当时保守和革新、复古和反复古、倒退和反倒退的尖锐斗争；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群而不党”是骗人的鬼话，任何思潮和学派，从来都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腐朽反动的旧思想、旧意识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仍然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修正主义思想回潮和马列主义反回潮的斗争也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一定响应十大的号召，继续深入批判林彪，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肃清孔孟反动思想的流毒，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

谈吴起的变法事业

胡井武

吴起（？——公元前三八一年），卫国人，是我国战国前期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事业作出了贡献，在我国历史上是有功绩的。

吴起所处的时代，正是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腐朽的奴隶制度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奴隶同奴隶主、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着剧烈的阶级搏斗。旧的奴隶制在无数次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和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冲击下，正趋于崩溃，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经成了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是倡导“法治”，进行变革，促进新制度的建立，推动历史前进；还是维护“礼治”，反对变革，挽救旧制度的崩溃，把历史拉向后退，这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吴起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大力倡导，并积极推行法家的革新路线。早在青年时期，他在鲁国就向儒家的“仁”、“孝”挑战，母亲死了，也不回去，他的老师曾参对此大为恼怒，以致与他断绝了关系（“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后来，他到了法家发祥地之一的魏国，积极参

与了李悝的变法活动。他在魏国任军事将领时，和士卒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魏文侯因为他善用兵，在士兵中有威望，又命他当“西河守”，抗拒秦、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特别是他在辅助楚悼王期间，敢于冲破反动腐朽的奴隶主势力的阻挠，坚持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楚国是当时奴隶主贵族势力比较顽固的国家之一。虽然公元前四七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白公胜闹过一次革新，杀掉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把国王也囚禁起来了，但由于革新极不彻底，在旧贵族的反扑下失败了。当时韩、赵、魏和齐等四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早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可是楚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仍然操纵在昭、景、屈三家大奴隶主贵族手里。他们拚命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度，残酷镇压奴隶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把楚国弄得政治腐败、经济雕敝，民不聊生（“其政骚，其民疲”《吴子·料敌》），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公元前四〇二年，楚声王被“盗”所杀，就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楚悼王即位后，接连被三晋（韩、赵、魏）的联合力量所战败，丧失了大片土地。公元前四〇〇年，三晋曾伐楚到乘丘。公元前三九一年，三晋又伐楚，大败楚于大梁、榆关，楚用重礼贿赂秦，求秦从中调停，才得与三晋讲和。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逼迫下，楚悼王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下令求贤”，实行政治变革。

这时，吴起在魏国遭到保守派的排挤，来到了楚国。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宰相），主持变法。变法刚开始，就遭到楚国奴隶主贵族的竭力反对，说变法“是变其故易其

常”，要吴起赶快停止变法，（“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淮南子·道应训》）。并破口大骂吴起是“祸人”，甚至连支持革新的楚悼王也被他们骂成“逆天道，戾人理”（《淮南子·道应训》）。真是嚣张已极，猖狂透顶！

面对极端顽固的奴隶主贵族的攻击，吴起无所畏惧，毫不动摇。他一针见血地向楚悼王指出：楚国之所以“贫国弱兵”，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说：是由于楚国奴隶主贵族的权势太大，和分封爵禄的人太多。因为这样，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就不能集中在国王手里，而这些权重势大的奴隶主贵族必然是“上逼主而下虐民”（《韩非子·和氏篇》），造成“贫国弱兵”的局面。如何扭转这种局面，代之以“富国强兵”？吴起认为必须“明法审令”，就是应当严格地推行法治。

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这是吴起革新的第一条措施。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保障了奴隶主世代掌握政治、经济大权。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分封太众”，国君的权力越来越小，以致在楚国出现了北方国家畏惧楚国的大贵族昭奚恤，而不怕楚王的奇闻（“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战国策·楚策·江一对楚宣王》）。为了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吴起下令凡封君的子孙已传三代的，收回爵禄（“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篇》），疏远的公族，一律除籍（“废公族疏远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并把没有能力和无关紧要的官职，一概裁减（“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蔡泽说应侯》），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楚国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根据这种情况，吴起便采取“以所不足益所有余”的政策，下令强迫那些民愤较大的奴隶主贵族，离开盘踞的世袭领地，迁到边远荒凉地区垦荒，变相没收他们原来分封的领地（“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样，一方面开发了边疆，发展了经济，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

为了防止贵族的捣乱活动，吴起还禁止他们互相勾结，干预国家政令；同时统一舆论，禁止有碍改革的议论（“言不取苟合”《战国策·秦策》）（“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吴起的这些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沉重地打击了没落奴隶主贵族势力，为楚国封建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使楚国由弱变强，迅速成为战国前期的第二个强国。

吴起推行法家革新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强兵”，以革命暴力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服务。吴起早在魏国协助李悝变法时，就总结了历史上有的国君“修德废武”，不重视军事，国家被灭；有的国君只“恃众好勇”，不注意政治，也丧失了“社稷”的教训，明确提出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既要重视政治，又要重视军事。并以自己卓越的军事成就，为李悝的变法，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起在楚国进行变法时，更是明确提出“要在强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把“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节省下来的钱，“以奉练选之士”（《韩非子·和氏》），并下令加固都城，巩固防卫。

在“强兵”时，吴起十分注意用法治思想治军。他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鸣金撤退而不退，击鼓前进而不进，这样的军队“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子·治兵》）。因此，他治军时严格推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的政策，并“行之以信”（《吴子·治兵》）。

由于吴起重视强兵，使楚国在军事上也不断强盛起来。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辅助楚悼王革新后，“南平百越（退守于五岭一带山中的一个春秋战国少数民族），北并陈、蔡（西周的两个封国），却三晋，西伐秦”，而且在公元前三八一年，救赵攻魏，“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一直打到了黄河两岸（《战国策·齐策》）。

没落奴隶主阶级对吴起加强革命暴力，十分仇视。楚国的奴隶主贵族这股反动势力，都要把吴起害死。当时楚国有个叫屈宜若的大奴隶主贵族跳了出来，叫喊什么“兵者凶器也”，并破口大骂吴起“好用凶器”，是“阴谋逆德”，“逆之至也”（《淮南子·道应训》）。这完全是一派儒家的胡言乱语，这正说明吴起是一位反对儒家所谓“仁政”，坚持革命暴力的坚强战士。

正当吴起变法在楚国开始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楚悼王去世了，早就伺机反扑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发动了反革命叛乱，在悼王治丧处围攻吴起，吴起机警地伏在王尸上。仇恨吴起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奴隶主贵族势力，竟不顾一切后果，迫不及待地用乱箭射死吴起，并中王尸。楚国法律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继位的楚肃王下令，“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七十余家（《史记·孙

子吴起列传》)。吴起不幸遇害，但发动叛乱的奴隶主贵族也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由于变法的时间短，楚国奴隶主贵族势力大，吴起的变法被扼杀了。但是，吴起的变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政治改革的迫切要求，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标志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它是革命的，进步的。这次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变法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当时收到了一定的“富国强兵”的效果。因此，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高度赞扬吴起说：吴起的主张“用之魏则魏强，用之楚而楚伯(霸)”（《墨子批选序》）。在变法过程中，有力地冲击了奴隶主阶级在楚国的反动统治，打破了奴隶主贵族的一统天下，为楚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吴起变法的思想和实践，为后世法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他很重视军事，把改革和加强军事作为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证变法的一项重要措施。他的这一思想及其在军事上的成就，对于以后法家思想的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在秦国变法，并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杰出法家代表商鞅，所制定的一套完整的法家路线和变法内容，就是在研究和总结了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著名的法家韩非所说的：“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

杀害吴起，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反攻倒算，是继孔老二杀少正卯之后的一次严重的反革命暴行，又一次揭穿了儒家宣扬的所谓“王道”“仁政”的虚伪性。吴起的被害，说明了没落的垂死的奴隶主贵族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吴起是恨之入骨的，也说明了一个新的社会

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革新与保守、复辟与反复辟尖锐斗争。

（原载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光明日报》）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

论商鞅的历史功绩

陕西师范大学 师 之

商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死于公元前三三八年，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来，国内外的反动派对商鞅恨之入骨，进行了种种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古代的孔孟之徒就骂他是“蛆、蝇、粪、秽”，说“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四《商鞅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骂商鞅“厚颜无耻”，说他的思想使他们“感到厌恶”。叛徒、卖国贼林彪拾历代反动派的牙慧，也恶毒咒骂商鞅和法家。这些中外反动派对商鞅如此咬牙切齿，深恶痛绝，正好说明商鞅在我国历史上代表着革命的进步的势力，正好说明商鞅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正象桑弘羊评价商鞅时所说的“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一

商鞅本是卫国人，姓公孙，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坚定地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鞅少好刑名之学”）。大概是出于为新兴地主阶级效力的动机，这位青年别离了故国，到了已经实现封建夺权的魏国，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开始了战斗的一生。

春秋末、战国初，新兴地主阶级在一些国家相继开展了夺权斗争，新兴的封建制度正逐渐取代腐朽的奴隶制度。在这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商鞅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他进一步发展了法家思想，从理论上为新兴地主阶级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商鞅认为，在当时新兴的封建国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立法和时代相背离，而体制和实际相脱节的危机（“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这种危机的根源来自当时政治生活中“法古”和“循今”两种倾向。所谓“法古”，就是倒退，即新兴的封建国家却墨守着腐朽的奴隶制章法（“国形更势矣，而务以古。”）；所谓“循今”，就是保守，即新兴的封建国家对大量被人民变革了的现实熟视无睹，苟安保守于已经取得的成果，不图变法进取（“今民能变俗矣，而法不易。”）。因此，商鞅认为，新兴封建国家当时面临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也就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实行彻底的变法（《群书治要》卷三十六）。

商鞅的变法思想切中时弊，准确地抓住了当时政治的要害。例如在新兴的赵国，相国公仲连就将牛畜、荀欣、徐越等儒家之士，拉进封建政权，用“仁义”、“王道”那一套孔老二的学说，大搞复古（《史记·赵世家》）；在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在夺权后虽然也搞了一点新法，然而，“晋之故法未息”，这样就造成了封建制的新法和奴隶制的旧法“新故相反，前后相悖”的混乱状态（《韩非子·定法》）。至于在新兴的魏国，最高统治者魏文侯起初也象赵国一样，大搞“尊贤下士”，热衷于成为孔孟之徒鼓吹的“仁君”，

所走的仍是复古的道路。后来，魏文侯以及他的儿子魏武侯重用法家代表人物李悝（音亏，kuī）为相，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实行以“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也就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变法。但是，李悝的变法仍然是很不彻底的。他对没落奴隶主阶级没有进行坚决的打击。这样，所谓“尽地力之教”就势必只能收效于一时，而复辟势力却日益抬头。当李悝死后，另一个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吴起被排挤而出走，后来，商鞅也差一点因此而致死。总之，或者复古倒退，或者保守现状，这两种倾向在当时各个新兴的封建国家都严重地存在着，滋长着。商鞅明确提出必须变法以反对复古、保守这两种倾向，这说明他具有捍卫新兴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坚决立场和对形势敏锐的洞察力。

既然必须实行变法，那末，什么是变法的当务之急呢？李悝说：“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而商鞅却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商君书·开塞》）意思是“去奸”才是变法的当务之急。李悝重法，商鞅也重法，这是相同的；但李悝重法以“去盗贼”，而商鞅则重法以“去奸”，这是不同的。这个不同，是商鞅对于法家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

商鞅的所谓“奸”包括着“奸民”和“虱”。他说：“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为奸民。”（《商君书·画策》）十分明显，这种“奸民”不是农民，也不是奴隶，而是不从事农业、不为新封建政权参战而得以既富且贵、有权有势的奴隶主世家贵族、儒家之士和奴隶主商人。所谓“虱”则是“诗书”、“仁

义”等反动的孔学（《商君书·靳令》）。商鞅认为，如果新兴的封建政权不首先清除孔学，那末，就必然会出现封建国家“为法于上，而民议之于下”造成“法令不定”的结局（《商君书·定分》。“而”字原作下，据意改）。因此，新兴封建政权必须“燔（烧）《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为实行变法创造条件。

“去奸民”是“去奸”思想的核心。商鞅认为，如果不除去奸民，那么，人们看到“奸民”“学《诗》、《书》……可以求官爵”，做商人“可以富家”，于是，豪杰“皆务学诗书”，而农民则“（逃）避农（业）、战（争）”（《商君书·农战》），从而破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所以他又主张新兴的封建国家必须“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从而改变“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一人耕而百人食”的状况。

总之，把“去奸”视为变法的当务之急的思想，其矛头是直接指向当时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这证明商鞅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法家思想家。他对于当时地主阶级的主要敌人有正确的认识，为新兴的封建国家指明了斗争方向。

怎样才能“去奸”？商鞅说：“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商君书·开塞》）这是商鞅对于法家思想的另一个重大发展。

在商鞅的以刑去奸的思想中，他特别强调“壹刑”和“重刑”。所谓“壹刑”，就是“刑无等级”，奴隶主犯法同样要受刑，和孔老二的“刑不上大夫”针锋相对；所谓“重刑”，就是刑和赏相比，应该重刑轻赏。他说，这样可以迫使奸民“莫敢为非”，从而达到“无刑”的目的。所

以，商鞅又常常把他的以刑去奸的思想，称之为“以刑去刑”。他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

总之，概括地说，商鞅对于法家思想的发展就在于，他主张用“严刑”以“去奸”。在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夺取了政权的时代，商鞅的这种思想正好表达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革命要求。但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却咒骂法家是“罚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攻击商鞅的思想“反人道”，这证明他们同当时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完全站在一个反动立场上。

二

在保守和复辟势力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魏国，具有法家思想的商鞅自然是不能被当权者容纳的。当时，商鞅在魏相国公叔痤（音错，cuò）手下任中庶子之职，不过是相府里的一员家臣。但相国对这位反对复古、保守的青年既恐惧又痛恨。他曾经秘密地向魏王建议说，假如不能任用这“年虽少（却）有奇才”的商鞅为执掌国政的大臣，那么，就必须杀死他，“无令出境”。随后，这只老狐狸又假装出一副“诚恳”的姿态，把他向魏王的建议泄露给商鞅，并且劝他赶快逃走。公叔痤的这种卑鄙行径，无非是想达到即使不能杀害商鞅，也要将他撵出魏国的目的，而在这场迫害案中却不留下自己的罪迹。但是商鞅并没有上公叔痤的圈套，他冷冷地回答这位相国老爷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所以他照旧耽在魏国。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得知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这才从容地离开魏国，进

入秦国。

秦在战国初期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被中原各国卑视为“夷翟”，没有参加各国间“会盟”的资格。公元前三八六年以秦献公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夺得政权后，秦国出现了一股奋发图强的潮流。秦献公死后，公元前三六二年，秦孝公继位。他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于即位的当年就“下令国中求贤”。商鞅入秦正好适应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公元前三五六年，商鞅被任命为主持政事的最高长官——左庶长，经过长达十八年的变法运动，终于使秦国新兴地主阶级实现了“国以富强”的宿愿，奠定了秦国后来统一六国的基础。

在商鞅变法的前后，一些国家也都进行过相同性质的变法。但没有一个真正取得富强的结果。唯独商鞅变法得到了成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必须从商鞅变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它的特点中去寻找答案，从而认识商鞅在政治上所建树的功绩。

商鞅变法的第一个特点是，他没有匆匆忙忙从事具体的变法事务，而首先发动了一场法家对儒家的激烈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这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一场真正具有一点规模的反孔斗争。当时在秦国，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复辟、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是甘龙、杜挚，斗争的中心问题则是能不能“变法以治，更礼以教。”

甘龙、杜挚以为，据秦国的“旧法而治者，吏习民安”，所以，“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是他们的结论。

商鞅以“强国”、“利民”为出发点，根据历史经验，彻底驳倒了儒家的复古倒退的谬论。他指出，历史是一代比

一代发展的。“（夏、商、周）三代不同礼而王，（春秋）五霸不同法而霸。”有“何古之法？”又有“何礼之循？”恰恰相反，“（商）汤、（周）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纣）、夏（桀）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说明，不“法古”同样可以兴盛，虽“循礼”，同样难免灭亡。因此，为了“强国”，应该“不法其故”，“不循其礼。”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商鞅在变法前发动的这场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秦孝公在总结这场斗争时曾经说过：“寡人不之疑矣！”（《商君书·更法》）意思是他坚定地相信法家思想了。秦孝公是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他的这句话说明，正是通过这场思想斗争，才使新兴地主阶级坚定了必须变法的信心和决心，认清了变法的方向和道路。

由于法家思想本身的阶级局限，它能动员的群众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本身。但是，无论是在李悝变法中，还是在吴起变法中，连发动本阶级的思想斗争都没有进行，他们的变法就势必流于极少数法家的活动。因此，也就不可能取得多大的变法成果。

随着法家思想路线的胜利，自然就带来了商鞅变法区别于其他各国变法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比较彻底、比较坚决。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打击奴隶主世家贵族、奴隶主商人，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按军功大小授官爵，据努力从事农业所取得粮食多少给奖励的新体制；二、“废井田，开阡陌”，彻底废除奴隶制下的土地制度，建立民得自由买卖的封建土地制度；三、加

强中央集权制，建立县制，由中央直接派官吏治理，并且在全国统一度量衡。四、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推行对儒家思想实行专政的政策。商鞅变法还有其他许多内容，但仅仅从以上几项基本内容，人们就可以看到，这次变法触及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是在这以前任何一次变法都不可比拟的。

由于商鞅变法比较彻底，所以，在秦国对复辟势力和旧奴隶制的打击就比较彻底，对新兴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培植就比较有力，这反过来又使商鞅变法有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得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取得比较大的成果。

历史上任何破坏旧制度的革命，总是要引起旧制度维护者的疯狂反抗。秦国自然也不会例外。商鞅对旧贵族破坏变法的行为实行了相当坚决的镇压。有一次，秦孝公的太子嬴驷触犯了新法。商鞅对秦孝公说：“法令所以不能彻底推行，就是因为贵族破坏的缘故。因此，假如要使变法得以实行，应该先法办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可用刑，那就对太子的老师用刑。”（《史记·秦本纪》）于是，就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用了刑。史书上记载说：“（商鞅）罚不讳强大，赏不私近亲。”（《战国策·秦策》）这是他变法能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曾经把最早实现夺权的韩、赵、魏三国与较晚才实现夺权的秦国进行过比较，他说“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韩、赵、魏）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意思是：韩、赵、魏三国由于奉行儒家的学说，造成国家乱而弱的局面；秦国由于实行法家的路线，才取得国家治而强的硕果。韩非

这个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说出了问题的本质。归根到底，商鞅变法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秦的日益强大，这是由于秦国奉行了一条反孔的法家路线的必然结果，也是鼓吹“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家路线彻底破产的有力证明。

三

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死后，那个曾经触犯过新法的太子嬴驷继位，这就是秦惠文王。

随着秦惠文王的登台，那些曾经在变法过程中受过打击的各种反动分子立刻从各种阴暗角落里爬了出来，在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的主谋下，他们捏造了所谓“商鞅欲反”的罪名，用最残酷的刑法——车裂，将杰出的法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商鞅杀害了，并残酷地杀绝了商鞅的全家。

早在这场卑鄙无耻的残杀案发生前，有个叫赵良的孔老二的信徒，曾经和商鞅作过一次谈话，就处处显露着杀机。他说：“被你处过刑的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书经》上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的生命就象早晨的露水一样，……假如秦孝公一旦逝世，秦国用来收拾你的办法，难道会是轻松的吗！”（《史记·商君列传》）果然，五个月后，商鞅被杀害了。不仅凶案的主谋就是那个“闭门不出已经八年”的公子虔，而且采用的确实是最残酷的刑罚。赵良的谈话是一项铁证，证明秦国反对变法的奴隶主复辟势力杀害商鞅是蓄谋已久的；同时也证明：他们杀人的理论根据就是儒家的经典，孔老二的理论。他们整天口口声声地高喊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似乎是一些“以仁爱之心待人”的“忠厚长者”，其实他们所谓的“仁义道德”，

对人民，对革命者，就是暗害，就是车裂，就是全家杀绝。真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从商鞅被杀害到一九六九年我们伟大祖国二十周年大庆，时间过去了两千三百零七年，连“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八个字也已经不能在今天的《书经》中找到了。但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却挖空心思找出儒家的这条杀人理论，并且特别选择了我国大庆的日子，写成条幅，挂在床头，这就充分地暴露出他那仇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仇恨我们革命人民达到疯狂程度的狰狞面目。正如当年赵良的谈话一样，这条幅也是一项铁证，证明后来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所策划的血腥大屠杀同样是蓄谋已久的。

秦国的反动派和林彪反党集团都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是两件极好的反面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许多理论的和政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

不错，儒家的理论是主张德，也就是仁义的；而法家则主张力，也就是刑法的。但是，儒法之间分歧的实质在那里？在仁义和刑法吗？否！儒家的所谓“德”和“仁义”不过是招牌，“车裂”和“全家杀绝”才是它的实质。儒家和法家一样，都是“恃力”的，都是讲专政的，只是法家主张“以刑去奸”，而儒家则主张镇压进步的人们。换句话说，究竟是奴隶制的专政还是封建制的专政，这才是分歧的实质所在。以此推论，我们又可以明白，秦国反动派当时抬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理论，无非是说，奴隶主阶级靠专政是会“昌”的，新兴地主阶级靠专政是要“亡”的；林彪重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老调，就是为了攻击无产

阶级专政，为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制造反革命舆论。当反革命复辟势力还潜伏着的时候，无论是古代秦国的奴隶主复辟势力，还是现代林彪反党集团，总是要鼓吹这种反动理论的，但是一旦他们自以为抓住了时机，就立刻把这种反动的理论化为赤裸裸的反革命的暴行。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切切不可把反动派的鼓吹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视为纯粹的理论斗争，掉以轻心！

历史的前进恰如江河的运行，总是要经过无数的暗礁、峡谷，经过曲折、回旋，才能奔腾向前。两千多年前，继新兴地主阶级夺权胜利之后，各国的变法一个又一个地失败了。在那天空里浮起一片乌云，大地上出现一股逆流的时候，适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商鞅变法驱散了乌云，冲破了逆流，终于获得了成功。商鞅本人虽然被秦国的奴隶主复辟势力杀害了，但是，由商鞅变法开始的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建立封建的上层建筑的斗争，后来不仅为新兴地主阶级所坚持，并且又为秦始皇所发扬，终于统一了六国，奠定了秦及秦以后建立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其历史功绩不容抹煞，历史地位不容否定。今天，研究和探讨这段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林彪尊儒反法的反动本质，更好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

（原载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光明日报》）

荀孟之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吉林大学 劲云戈

战国时期，在思想战线上，发生过一场荀况（字卿）和孟轲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二千年来被许多历史学家说成是儒家内部的斗争，掩盖了它的阶级实质。其实，荀孟之争是商鞅变法后儒法两家的一场决定胜负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改革与反改革、反复辟与复辟两条路线的斗争。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吹捧儒家，攻击法家，一心要搞复辟倒退，极端仇恨革命事业。因此，弄清荀孟之争的阶级实质，有利于进一步认清儒法斗争的意义，进一步认识法家的进步作用和儒家的反动作用，也有利于进一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

一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由于奴隶主贵族国家政权的衰落，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迅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破坏了作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井田制，出现了新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初税亩”，说明没落奴隶主政权不得不承认新兴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的合法存在。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铸刑书”，公元前五一三

年，晋国“铸刑鼎”，说明了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马克思曾经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我国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中，奴隶起义动摇和摧垮了奴隶主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向奴隶主贵族夺权；与此相适应，出现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的变法运动。

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反复较量中进行的。魏国用李悝，按法家路线进行社会改革，编定了《法经》六篇，以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实行了按功劳大小定爵禄的制度，废除了世袭特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韩国用申不害为相，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实行了“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制度，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力量。赵国也任用法家人物，按照法家路线进行过社会改革。但是，魏、韩、赵（这三国把晋国分了，所以叫“三晋”）任用法家进行变法时，因为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力量还很强大，所以也重用反动的儒家，使法家的政治改革不能贯彻始终，三晋因此弱而乱。吴起在楚国按照法家路线进行了激进的变法运动，剥夺了享受超过三世以上的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爵禄，罢黜了他们的官职，把他们迁移到荒僻的地方。但是，在支持变法的楚悼王死去后，奴隶主贵族残暴地杀害了吴起，葬送了这次变法运动。此后，楚国也就削弱而且混乱了。韩非总结这些变法运动的经验，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韩非子·和氏》）；“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只有秦国

的变法运动，因为商鞅坚决排除了儒家的阻挠、干扰和破坏，才得以进行，才取得了胜利。

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在秦国推行法家路线，实行变法，持续了近二十年，实现了多方面的深刻的社会改革。在政治上，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者，不能列入公族籍，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生下来就享受爵禄、长大了就当官的“世卿世禄”制度；推行了极为严格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并开始确立“郡县制”，为逐步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商鞅规定有军功者按功劳的大小赏给官爵，具体地规定了奖赏等级，用以鼓励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而作战。其中最低的两个等级“公士”和“上造”，是为奴隶可以立功获得解放而规定的。在经济上，商鞅规定“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度，以巩固和扩大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所有制；还竭力倡导发展农业生产，凡是“耕织致粟帛多者”，可以“复其身”，即通过发展生产的途径来解放奴隶。在思想上，商鞅主张焚烧诗书，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商鞅变法实行以后，从根本上解决了秦国政权从没落奴隶主阶级手中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的问题，迅速地取得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加强了。

商鞅变法的胜利，在秦国内部和外部都引起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惊慌和恐惧，掀起了一股反秦反法的复辟逆流。当时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孟轲（公元前三九〇——三〇五年）是这股复辟逆流的代言人。他积极参与和策划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复辟事件。他在贵族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支持下，“后车数十

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到中原和东方各诸侯国游说，宣传“王政”等儒家反革命复辟的理论。宋王偃在对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反夺权以后，公开宣布要实行所谓“王政”。孟轲听了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说：天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宋，“欲以为君”（同上）。他亲自跑到宋国去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势力打气。

《孟子》一书把商鞅变法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复辟奴隶制度的理论和政策。后世儒家注释《孟子》的时候，对此都直认不讳。在政治上，孟轲把商鞅实行的新兴地主阶级“法治”和对奴隶主贵族的反抗的镇压宣布为“不仁”，公开叫嚷要对奴隶主贵族“施仁政”，恢复“世卿世禄”制度，要他们重新上台，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在军事上，孟轲把秦进行的统一战争诬蔑为“以力服人”，攻击商鞅是“嗜杀人者”，公然宣布“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即要处死商鞅。同时，他到处煽动大小诸侯用所谓“王者之师”，把中国统一于“王政”之下，即为复辟奴隶制度发动反革命战争。在经济上，对于商鞅废除井田制，使奴隶主失去了强迫奴隶劳动的特权，孟轲非常仇恨；他公然叫嚣“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就是说，行“仁政”必须从恢复井田制着手，使没落奴隶主阶级重新获得“恒产”，即世袭的封地和奴隶。孟轲在反对商鞅变法中，把儒家思想发展得更加反动了。

在孟轲的煽动下，一个叫赵良的儒家信徒，当着商鞅的面，引用《尚书》上“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两句话，攻击秦国的变法，威胁他交出政权，停止改革，否则，就要遭

到杀害。这短短的两句话，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对商鞅变法的刻骨仇恨。过了五个月，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了，秦的奴隶主复辟势力车裂了商鞅，并杀了他全家。

值得注意的是，两千年后的林彪，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在全国人民为二十年前用革命暴力推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而欢欣庆祝的节日里，把“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写成条幅，挂在墙上，发泄他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和恶毒咒骂。这是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也是林彪路线极右实质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没落奴隶主阶级虽然杀害了商鞅，但是“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特别是在秦昭王时，先后用法家范雎、蔡泽等人为相，坚持了法家的政治路线，继续剥夺一小撮奴隶主贵族的特权，进一步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促进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武装力量，多次打败了邻国的军队，扩大了领土，奠定了武装统一全国的基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胜利发展，给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反秦反法的复辟逆流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法家学派的理论家、思想家荀况是这场反复辟斗争的主要代表。

荀况（约公元前三一三——二三八年）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热烈拥护和坚决捍卫商鞅变法，全面、系统地批判了当时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荀况亲自到秦国作实地考察，会见了当时在秦国执政的法家人物范雎。他对秦国人民生活情况、政治态度、各级政权实行法治的状况，

都作了调查。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赞扬秦国的官吏执法严肃认真，不敢结党营私；朝廷能统制全局，行政效率高。他得出结论说：秦已接近“治之至”（《荀子·强国》）了，即接近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法治的最高理想了。他痛斥孟轲的所谓“仁政”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荀子·儒效》），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他反对孟轲恢复“世卿世禄”制度的主张，明确指出这种制度是“乱”的根源（《荀子·君子》）。他反对孟轲攻击秦和商鞅只行“霸道”的谬论，赞扬商鞅是“善用兵者”。他认定秦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合乎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秦四代君主都打了胜仗，“非幸也，数也”。他把“四海之内若一家”即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秦的军事胜利上（《荀子·议兵》）。荀况拥护废除井田制，主张“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提倡发展农村的个体经济，即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他批判孟轲“案往旧造说”（《荀子·非十二子》），即按古代传说编制理论，并要推行于现代。荀况把孟轲攻击商鞅变法、复辟奴隶制度的谬论宣布为“奸言”、“邪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孟轲“饰邪说，文奸言，以梟乱天下”（同上）。就是说，孟轲散布“奸言”、“邪说”的目的，是要搞乱新兴地主阶级的天下，以复辟奴隶制度。荀况从理论上对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系统地全面地进行了批判，给了儒家思想以沉重的打击。

二

荀孟在理论上的斗争，都是围绕着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制天命”还是“畏天命”，“法后王”还是“法先王”，“性恶论”还是“性善论”，这些理论上的斗争，都

是为了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还是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

“制天命”还是“畏天命”，这是荀况同孟轲进行斗争的第一个重要问题。

孔丘和孟轲都继承了文王、周公的唯心主义的道统，把“天命”作为奴隶主阶级行使统治权的根据。他们还把人间富贵贫贱、吉凶祸福都说成是“天命”决定的。孟轲还把他要承担的复辟奴隶制度的“大任”，也说成是“天降”的，宣扬“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他要人们相信，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权，是“逆天”的，一定要失败的；而他们复辟奴隶主专政，是“顺天”的，一定要成功的。这就是孟轲宣扬“天命观”的政治目的。林彪继承了孔孟的“天命观”，自比“天马”，宣扬“天才论”，也是为了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荀况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对儒家的“天命观”进行了批判和清算。他明确指出“天行有常”、“天有常道”（《荀子·天论》）。就是说，“天”是自然界，它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在运行，同人间的富贵贫贱和吉凶祸福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以大量事实，对儒家关于“天”决定人们命运等等的迷信言论，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判。他还说：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转换，“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同上）在批判了儒家关于统治权“天授”的谬论的同时，荀况提出一个必须“明于天人之分”（同上）的唯物论的原则，要把自然的“天”和社会的“人”分清。这就揭穿了孟轲和一切反动派关于统治权“天授”和复辟大任“天降”的欺骗宣传。

荀况认为“天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祲（妖）”，即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历数了与“人妖”有关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毒害的罪恶事实，然后指出：“其说甚迹（近），其蓄（灾）甚惨。”（同上）就是说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惨痛恶果，人们还记忆犹新。这就把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

孟轲的“天命观”没有帮助他完成复辟奴隶制度的“大任”；同样，林彪这匹“天马”也没有拉得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破车。

荀况不仅坚决地反对“天命论”，而且进一步提出“戡天”（征服自然）的积极主张。他提出并且发挥了人定胜天这个光辉的思想，批判那种在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他豪迈地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顺从着‘天’而歌颂它，怎比得掌握自然规律而运用它！”《荀子·天论》）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生产力的新发展，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发展生产的要求。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荀况对于自然界的朴素的唯物论的认识，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没有达到的。

“法后王”还是“法先王”，这是荀况同孟轲进行斗争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因为儒家站在没落奴隶主立场上，所以他们是“今不如昔”派，认为一切都是过去的好，对现在的什么都看不顺眼。孔丘把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视为“盛世”，而把他自

已生活的春秋时代视为“天下无道”的时代。孟轲把自己生活的战国时代看做是“世衰道微”的时代。在他们看来，春秋不如西周，战国不如春秋；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不如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总之，一代不如一代。根据这种倒退的历史观，他们提出了“法先王”这个复辟的政治口号。孟轲周游列国，推销的就是“先王之道”。他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子·公孙丑下》）。“法先王”就是要重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全面复辟奴隶制度。林彪忽而自比周文王，忽而教子学习文王“明传子孙”之道，同孟轲鼓吹“法先王”唱的是一个调子。

法家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认为现在比过去好，近古比远古好，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一代胜过一代。荀况认为确立了法治的秦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他称赞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荀子·强国》）即威力比商汤、周武王统治的国家强，国土比虞舜、夏禹统治的国家大；地主阶级的后王，超过了奴隶主阶级的先王。在这种社会不断前进的观点的基础上，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后王”的政治口号。他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他劝诸侯说：“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荀子·儒效》）“法后王”，就是要各诸侯国都效法当时的秦国，把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确定下来。

荀况一针见血地指出：孟轲用“法先王”这个政治口号，来“乱”新兴地主阶级的“世”，是为了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荀子·儒效》）。孟轲之流当时提出“法先王”这个复辟口号，等于白日做梦，最后胜利的恰是新兴地主阶级专

政。二千年后，林彪“法先王”，更必然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性恶论”还是“性善论”，这是荀况同孟轲进行斗争的第三个重要问题。

孟轲把奴隶主专政叫做“仁政”。他不但到“天”那里为它找根据，而且还到人性那里去找根据，这就是他的“性善论”。据孟轲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作为统治者的先王生下来就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即刘少奇说的“人类同情心”，林彪说的“仁爱之心”。孟轲的“仁政”即出自先王的“不忍人之心”。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系统地驳斥了孟轲的“性善论”。他认为人性就是“好利而恶害”，“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不知道也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所以是“恶”的。他说：“凡人之性者，……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就是说，高贵者和卑贱者的自然本性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恶”的，“善”（即合乎社会道德规范）是学习改造的结果（“伪”在这里是人为地加工制作的意思）。他指出：政治制度是社会的产物，“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同上）。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孟轲和荀况离开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谈论人性的善恶，在这一点上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但是，孟轲的“性善论”，是用来掩盖残暴而贪婪的奴隶主阶级本性，为复辟奴隶制度服务的。荀况的“性恶论”，揭露了包括儒家所吹捧的“圣人”和“先王”在内的奴隶主的掠夺、凶残、淫乱的阶级本性，撕下了他们假仁假义的面纱。同时，

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取代没落奴隶主阶级而获取政权的要求。他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荣辱》）。这虽然是用新的剥削阶级专政代替旧的剥削阶级专政，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却是进步的，革命的。

孟轲的“性善论”和“仁政”，只不过是蒙在残暴的奴隶主专政上的薄纱。林彪却称赞孟轲的“仁政”和“性善论”，颂扬儒家是“赏家”，有恩于人民。其实孟轲决不施“仁政”于人民。他说，人们天生的“善性”，“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依他说，既然平民和奴隶的“善性”已经失去了，对他们就只能用残暴的专政手段。至于林彪一伙写在《“571工程”纪要》上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同孟轲的“仁政”一样，也只是一种欺骗。荀况的“性恶论”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提供理论根据的。林彪就以此攻击法家为“罚家”。实际上，在法治条件下，法家并不是不要教育和改造工作。荀况说，既然“人性恶”，那就要“立君上之势以临之”（《荀子·性恶》），在强大的专政力量的压力下，进行化“恶”为“善”的教育改造工作。如果被剥夺了特权的奴隶主阶级的人们不肯转“恶”为“善”，那只能“重刑罚以禁之”（同上）。这完全是必要的。林彪攻击法家为“罚家”，他的现实政治目的，就是代表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要对他们“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三

以孟轲为代表的思孟学派（思指子思，即孔丘的孙子孔

伋；孟轲是他的学生的学生），是孔丘死后儒家各派中最有影响并自命为继承孔丘的正统派。荀况对孟轲的批判，给了儒家这个学派的根本理论和政治路线以致命的打击，使它声誉扫地。同时，他还横扫了儒家各派，斥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为“贱儒”，把那些“陋儒”、“散儒”、“腐儒”、“沟犹瞽儒”、“俗儒”们的装腔作势、装模作样、人云亦云、自欺欺人、追求利禄、乞求“酒食声色”的腐败堕落的无耻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批判得体无完肤。因为荀况是从儒家杀出来的，他熟悉儒家思想和儒家各派的内幕，所以他对儒家的批判能够切中要害。

荀况在给整个儒家学派以坚决打击的同时，还提出了禁止儒家学派的建议。他痛斥孟轲那样的复辟势力的死硬派为“奸人之雄”。他建议：“圣王起，所以先诛之（指儒家死硬派）也”（《荀子·非相》）。就是要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实行革命的专政。后来秦始皇和李斯之所以能够下决心把这个主张付诸实践，“焚书坑儒”，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反动儒生还继续捣乱，而且因为思孟学派骗人的理论已经被批倒批臭，在社会上声名狼藉。汉代赵歧说：经过了这次打击，“孟子徒党尽矣！”（《〈孟子〉题辞》）

荀况对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的批判，是新兴地主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对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荀况对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打击，是法家学派对儒家学派的胜利，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超过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

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而经济是基础, 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个胜利, 促进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斗争的胜利。荀况的弟子韩非, 继荀况之后, 集法家各派之大成, 进一步发展了法家思想, 为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荀况的另一个弟子李斯, 当了秦始皇的丞相, 把法家思想更广泛地付诸实践, 帮助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 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

荀况就是在同儒家及其他许多学派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的斗争中, 为法家确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唯物论的哲学体系, 他自己成为先秦最大的唯物论哲学家。但是, 后代儒家都以荀况曾以儒家为师, 并用过某些儒家语言为理由, 把他和孟轲并列为儒家, 说荀孟之争是儒家内部的斗争, 掩盖了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尽管如此, 后代儒家一点也没有因此减少对荀况的排斥和攻击。他们攻击秦始皇的时候, 总忘不了荀况提过有关“焚书坑儒”的建议, 也忘不了韩非和李斯是荀况的学生。

对于荀况属于那个学派的问题, 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分析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情况, 才能解决。荀况在商鞅变法后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 完全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 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 坚持法家路线, 反对儒家路线。这就最充分地说明了荀况是法家, 而不是儒家。正因为荀况的思想同其他法家一样, 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所以在秦和西汉前期, 即地主阶级还处在上升

的时期，他的著作曾广泛流传，并且有很深刻的社会影响。据记载，荀况的著作在汉初流传的有三百二十一篇之多。但是，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一个时期以后，逐步走向反动，荀况的著作同其他法家著作一样，受到了排斥和冷遇，现在只剩下三十二篇。直到中国社会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荀况的著作才被某些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重视。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阶级偏见，他们划不清儒家与法家的分界线，不能真正认识荀孟之争的阶级实质。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国无产阶级，才能给荀况和其他法家人物以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原载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孟轲——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

田 力

孟轲（约公元前三九〇年——前三〇五年），是孔家店的二老板。由于继承和发挥反动的儒家学说有功，长时期来被反动统治阶级捧为“亚圣”。孟轲是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深刻批判过的所谓“仁政”，就是孟轲极力鼓吹的一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口号。批判他的反动言行，分析他推行的政治路线的阶级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怎样力图复辟旧制度，怎样拚命攻击新制度，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认清林彪一类骗子的反革命本质。

“法先王”——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

孟轲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战国时代。当时，在不少诸侯国中，奴隶制政权先后垮台，地主阶级的新政权相继确立，法家的政治路线取得了统治地位。孟轲出生前后，有魏国的李悝变法和楚国的吴起变法，著名的法家代表商鞅，则是和孟轲同时代的人物。孟轲窜游各国猖狂从事复辟活动之日，正是商鞅在秦国大刀阔斧厉行变法之时。

阶级斗争的历史表明，一次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往往会有代表被推翻阶级利益的、一心搞复辟的反动人物出现。春

秋时代有一个专搞“克己复礼”的孔丘，战国时代又有一个专讲“法先王”的孟轲。与战国时代前进、革新的主流相对立的，是奴隶主阶级搞复辟、搞倒退的逆流。而孟轲就是这股逆流的代表人物。孟轲这个人野心很大，他一生奔走呼号，叫嚷“正人心，息邪说”，到处宣扬“法先王”的儒家政治路线。孟轲精心编造并鼓吹奴隶主“先王”的所谓“圣迹”，把早已过时的奴隶制吹得神乎其神，胡说只要以奴隶主的“先王”为榜样，“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法家荀况尖锐地指出，孟轲打出“法先王”的破旗，就是要“乱”新兴地主阶级的“世”，即颠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

当时，封建政权虽然在不少诸侯国建立，但奴隶主旧贵族在新政权内部还有相当的势力。一些执政者本身就是从奴隶主转化而来，与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孟轲正是利用这种条件，率领党徒以“先王之道”游说各国诸侯，施展其反革命的“攻心”战略。他认为，要“正人心”，必须先正“君心”，说什么“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孟轲在齐国时，三次会见齐宣王，都不谈具体问题。当他的门徒问他时，孟轲说：“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这就是说，他要从改变封建君主的指导思想入手，进而改变各国诸侯的政治路线，改变政权的性质。法家韩非锐利地看到了这一点，痛斥孟轲之流乔装打扮，摇唇鼓舌，张口“仁义”，闭口“先王”，其险恶目的就是要“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所以，是一批危害新社会的大蛀虫。（《韩非子·五蠹》）

大肆鼓吹所谓“仁政”，是孟轲推行“法先王”的反动

政治路线的一个中心内容。他说：“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孟轲的“仁政”到底是些什么货色？他在回答滕文公“问为国”时和盘托了出来。经济上，是恢复殷周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政治上，是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教育方面，是仿照殷周奴隶社会的教育制度，设“庠序学校”，用夏商周“三代共之”的奴隶主意识形态去教育统治者的子弟。总之，孟轲同他的“先师”孔老二完全唱着一个调子：凡是过去的奴隶主头子所推行的，都是最可爱、最完美的“仁政”，必须统统继承和恢复过来。

其实，被孟轲吹得天花乱坠的“仁政”，不过是为了掩盖没落奴隶主阶级残暴统治的一块遮羞布。在阶级社会里，在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情况下，压迫阶级对被压迫阶级，是谈不上什么“仁政”的。孟轲的反动说教，真正目的是为了反对、否定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为他的复辟行动造舆论。

孟轲宣扬“仁政”，念念不忘恢复“井田制”。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上》）这就清楚地说明，孟轲顽固地坚持要恢复已经被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打破的土地的“经界”，把奴隶们重新束缚在奴隶社会的土地分封制上。孟轲说，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入也。”（《滕文公上》）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美妙的井田制！孟轲胡诌这一套，决不是要让奴隶私有土地，而是主张恢复并保证大小奴隶主对奴隶的层层剥削。为此，孟轲还竭力鼓吹殷周奴隶社会的所谓“助”法，说什么“治地莫善于助”，“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

(《公孙丑上》)所谓“助”，就是指奴隶主及其国家强迫大批奴隶从事耕作，并直接占有其劳动成果。孟轲鼓吹“助而不税”，也决不是为了减轻奴隶的负担，而是要否定早在孟轲出生二百年前就已实行的、与封建所有制相适应的“税亩”制度。

在鼓吹“仁政”的同时，孟轲还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子，多次讲到所谓“民”的问题。他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下，编造所谓“先王”时代“民”的幸福生活的谎言，恶毒咒骂新兴地主阶级实行“虐民之政”。长期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据此而把孟轲捧为“民本主义者”和有“民主精神”的“进步思想家”。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给孟轲戴上了“民主性”、“人道主义”的桂冠，疯狂攻击我们的批林批孔运动。然而这是徒劳的。在《孟子》这部书中，“民”和“氓”或“野人”，其界限十分严格，是根本不同的概念。孟轲一切“为民”的口号，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别野人”，即不包括奴隶，不承认奴隶的解放。他一贯极端鄙视“野人”，极力鼓吹“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由此可见，孟轲心目中的“民”，并不是指奴隶，而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失掉财产和权力的奴隶主，和奴隶社会延续下来的“自由民”。孟轲的所谓“制民之产”，其实是要新兴地主阶级放弃封建土地所有制，重新分配土地给奴隶主和自由民。他提出“民为贵”，也是为了提高这些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政治地位。至于他所谓的“君为轻”，主要是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伪装成是“为

民”，而把他们真实的阶级目的掩盖起来，孟轲为复辟奴隶制而向地主阶级政权进攻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手段。中外反动派对孟轲的吹捧，只能证明他们是一伙敌视革命人民的孔孟之徒。

孟轲曾经引用过《诗经》上的一句话，叫做“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不要背离，不要遗忘，一切都必须遵照旧规章）他鼓吹“法先王”，鼓吹“仁政”、“复井田”和“民为贵”等一整套黑货，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要一切“率由旧章”，恢复奴隶制，实行历史的大倒退。为了亲自实践这条反动的“法先王”政治路线，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狂热奔走于齐、魏、宋、邹、滕、薛诸国之间。哪里出现反革命复辟的苗头，他就赶到那里去，全力支持复辟活动。齐国地大人多，而且有一个孟轲的党羽匡章在那里“将五都之兵”。孟轲就三次入齐，策动复辟，公然叫嚣由齐国先行“王道”，易如反掌。宋国的宋王偃一度宣布要实行“王政”。孟轲就要宋王偃象当年商汤和周武王那样“发扬武力”，“把那些该死的统统杀光”。一时，小小的宋国竟成了奴隶主图谋复辟的大本营。但是，宋王偃的倒行逆施，由于不得人心，遭到人民的反对，只落得个狼狈出逃、身死异国的可耻下场。奴隶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孟轲妄图用“法先王”的反动政治路线来复辟奴隶制，终究也不过是一枕黄粱。唐朝韩愈是一个尊孔派，他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进学解》）拚命为复辟奴隶制辩护而不见什么效果，跑了很多地方而没有什么成就，最后还是在到处碰壁的处境中完结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孟轲的下场。

反秦反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立场

秦国的变法进行得最彻底，变化也最显著。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奴隶主旧贵族掌握着实权。他们骄奢淫逸，私斗成风，以致政局混乱，国土日削，经济也十分落后。中原各国把秦国视同夷狄，取消它参加诸侯“会盟”的资格，气得秦孝公说：“再没有比这个更丢脸的了。”商鞅厉行变法后，秦国在十几年内迅速富强，连续几次打败魏国，中原诸国不仅与秦国“会盟”，而且都来“朝贺”了。秦国的情况生动地说明，只要顺应历史潮流，坚决采取法家路线，落后的国家可以一跃而变为先进。反之，韩、魏等国，由于变法不彻底，不坚决屏弃儒家的反动路线，就削弱，就落后，甚至出现倒退。正如法家韩非所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韩非子·有度、外储说左上》）这是符合战国实际情况的总结。

商鞅变法的胜利，秦国的兴起，引起奴隶主阶级的极大仇恨。在秦国内部，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反攻倒算，“车裂”商鞅。在中原各国，他们利用各国统治者对新兴秦国的恐惧心理，到处进行反秦反法的活动。孟轲作为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言人，也重整儒家的破烂旗鼓，向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路线发动了猖狂进攻。

孟轲首先对当时法家路线统治下的整个政治形势进行攻击和诬蔑。如同孔丘把春秋时代看成“天下无道”一样，孟轲把战国时代说成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人将相食”的黑暗时代。（《滕文公下》）他咬牙切齿，到处骂

街，叫嚷：“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他宣称，春秋时代的“五霸”是夏商周时代“三王”的“罪人”，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是“五霸”的“罪人”，而推行法家路线的“大夫”是各国诸侯的“罪人”。（《告子下》）一部《孟子》，**“半是挽歌，半是谤文”**，除了缅怀奴隶制的哀音，就是对战国时代新社会的恶毒诽谤。

孟轲最仇视法家所推行的两项主要政策。其一是，“辟草莱”“开阡陌封疆”；其二是，“赏军功”。前者奖励新兴地主阶级和自由民开垦荒地，否定了奴隶主世代垄断土地的制度。后者强化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否定了奴隶主贵族垄断军政大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商鞅变法最根本的也就是这两条。实行了这两条，就可以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摧毁奴隶制度，发展封建制度。孟轲则认为，干这两件事的都是罪大恶极的“民贼”，必须处以重刑。为了反对这两项主要政策，孟轲挑起了两个论战，即所谓“义、利”之辩和“王、霸”之争。

孔丘标榜“罕言利”，胡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轲突出发挥了这个反动谬论。他满口“仁义”，而把法家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各项政策，归结为一个“利”字，横加诋毁，说它“危害”人心，是一切祸乱之源，诬蔑法家是“暴君污吏”，是“孳孳为利”的“强盗”。法家确实是公开讲“利”的。商鞅就说过：“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都维护和坚持本阶级的利益，一切政治、道德、哲学概念都是一定阶级利益

的反映。只不过革命的阶级，进步的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生产力的发展一致，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能够公开“言利”。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言利”，就属于这种情况。与此相反，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对立，与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对立，与社会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就不敢公开“言利”，而是用某种抽象的、永恒的道德原则来掩盖本阶级的私利。孟轲所宣扬的“仁、义”之类，正是这种东西。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这话清楚地说明，所谓“仁、义”，就是要维护“亲亲为贵”的奴隶制统治秩序，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私利。商鞅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的“仁、义”，实际上是搞“亲亲者，以私为道也”，是“暴之道”、“过之母”。（《商君书·开塞、说民》）是祸乱之源。

“王、霸”之争，与“义、利”之辩是密切联系着的。战国时代，顾名思义，是充满战争的时代。毛主席说：“‘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论持久战》）新兴地主阶级要消灭奴隶制政权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实现全国的封建统一，不搞“强兵”，不打仗，能够办得到吗？不行！法家明确地回答，必须强兵，必须打仗。商鞅响亮地提出要“以战去战”，（《商君书·画策》）这是一个十分光辉的思想。孟轲把法家的这种强兵政策和为实现统一所必须的封建兼并战争，诬蔑为“霸道”、“好战”、“嗜杀人”。这恰恰表明，孟轲所反对的正是革命的暴力、进步的战争。实际上，他和孔丘一样，到处

鼓吹反动的武力“征伐”，煽动奴隶主复辟势力武装夺权，策动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实行反革命武装干涉。他对这种“征伐”极力加以美化，说什么：“征者，上伐下也”，“征之为言正也”。（《尽心下》）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孟轲嘴里讲的是“王道”，行的却是“霸道”，是一个十足的奴隶主霸权主义者。

孟轲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党，对法家路线大肆攻击以后，气势汹汹地威胁法家说：“你们这样搞下去，不改变政治路线，即使得了天下，你们的政权一天也维持不了”。（《告子下》）但是，历史的发展不以孟轲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不仅没有立刻垮台，反而进一步巩固下来，执行法家路线最坚决的秦国，则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孟轲的反革命凶言，同注定灭亡的奴隶主阶级一样，被无情地淹没在汹涌前进的历史洪流里。

“性善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摧垮了奴隶制度，也动摇了以“天命论”为核心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唯物论的思想有了显著的发展。为了坚持奴隶主意识形态，孟轲把“天命论”和“人性论”结合起来，用“人性论”补充“天命论”，鼓吹“天人合一”，炮制了一条更为反动、更富有欺骗性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

孟轲的“性善论”，就是继承了孔丘、子思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并加以发挥的。尽管他在口头上说什么“人无有不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

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但是，实际上孟轲一再强调这种“善性”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仁、义、礼、智等奴隶主阶级道德的源泉，说明他只承认反动奴隶主阶级才具有这种先天的“善性”。孟轲认为，这种“善性”，在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贤臣”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有不忍人之心”，能够“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也就是“王政”。他们具有“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尽心上》）是“先知”“先觉”者，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生的统治者。可见，孟轲的“性善论”完全是奴隶主阶级的“天命论”和“人性论”的大杂烩，是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而制造的反动理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善恶观属于道德范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善恶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东西，对被剥削阶级说来一定是恶的。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认为是善的，没落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一定认为是恶的。反之亦然。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必须镇压奴隶主旧贵族的反抗，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这就是“善”，这样做好得很。商鞅说：“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所谓“去奸”，首先是指镇压反抗封建制度的奴隶主。商鞅认为，对于他们必须“求过不求善”。（《商君书·开塞》）就是说，不能把他们看作“善”人，而要对他们实行专政。

孟轲在他的反革命一生中，就是用这种奴隶主阶级的“性善”标准，去对待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凡是符合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他就认为是“善”，竭力加以支持；

凡是不符合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他就认为是“恶”，疯狂地跳出来反对。燕国大臣子之掌握了政权，实行封建变革。孟轲认为这是对奴隶制的亵渎，必须严加镇压。他急急忙忙从鲁国窜到齐国，竭力煽动齐王出兵，说什么“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史记·燕召公世家》）要齐王以周文王、周武王为榜样，出兵讨伐燕国，支持顽固势力，镇压新兴地主阶级。在孟轲的策动下，他的党羽匡章，亲自率领齐军对燕国进行武装干涉，抓住了子之，并极其残酷地把他剁成肉酱。燕国这场方兴未艾的政治变革，就这样被血腥地镇压了。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孟轲“性善论”的凶残本质。

按照孟轲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既然人性生来就是善的，为了保存和发展这种“善”性，就必须避免外界的影响，在主观内省上下工夫，“存其心，养其性”，做到“反身而诚”。（《尽心上》）孟轲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这就是说，“诚”是上天规定的精神法则，为人之道就要竭力做到“诚”。人们要不断地“反求诸己”，努力探求和扩充内心所固有的“善端”。“至诚”可以通“天”。一旦达到了这种最高境界，统治者就能成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圣者”、“神明”；被统治者就会自觉地“服从”统治。这无非是企图从哲学上来论证奴隶制的“永恒”不变，恢复奴隶制的“天然合理”。孟轲鼓吹的一整套以“诚”为核心的“修养经”，是如此阴险毒辣，以至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如曾国藩、蒋介石、刘少奇、林彪，都把它奉为至宝，视为“立国”之本和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原动力”。其目的就是要用

“诚”来掩盖他们的虚弱本质；掩盖他们的野蛮残暴的反动统治；掩盖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孟轲是我国历史上在新兴政权下鼓吹复辟的反动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反动理论、反动路线、反动策略，为历代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派所承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时，也承袭了孟轲这一套反动货色。刘少奇的黑《修养》，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就有孟轲的幽灵。但是，孟轲也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也好，他们既然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就不可避免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韩非的思想是战国末期 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这篇文章，是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志共同研究写成的。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成了这篇论文。这件事说明工农兵理论队伍正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也说明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可以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这种做法也是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好形式。

——《人民日报》编者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每当儒家的徒子徒孙们提到这个时代，总是破口大骂，说什么，那时候强盗当上了王侯，而不讲仁义的国家倒强大起来了。（“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谖〔jué音决〕之国，兴立为强。”见刘向《战国策书录》）还说什么，那时候搞得人们“父子不相亲，兄弟不

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总而言之，是看起来“颠倒错乱”，说起来“胆战心寒”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哪些人才感到“错乱”“心寒”呢？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当时，在轰轰烈烈的奴隶大起义的推动下，奴隶制度一天天土崩瓦解，新兴地主阶级乘势起来夺权，使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惊慌失措。

到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夺权与反夺权，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更加激烈。儒法两家的斗争，作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了一个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人物，就是韩非。

一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年——公元前二三三年），韩国人，出身奴隶主贵族。他和秦始皇的丞相李斯，都是法家荀况的学生。在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在荀况和前期法家思想的影响下，他看清了时代变化的潮流，背叛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韩非曾经多次向韩王提出革新变法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韩非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写成文章，后人把这些文章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这部书对先秦法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儒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作了尖锐而有力的批判。秦始皇看到韩非写的《孤愤》和《五蠹》（dù音杜，蛀虫）等文章的时候，高兴地说：“如果我能见到写书的这个人，能同他交往，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

遗憾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思想是多么符合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

韩非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顺应历史的潮流，认真地总结了先秦时期各国变法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法家治国的理论和政治纲领。韩非特别重视各国在变法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并认真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秦孝公死后，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对掌权的秦国新兴地主阶级进行了猖狂反扑，商鞅遭到车裂，教训是十分沉痛的。韩非认为，不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就不能在夺取政权之后巩固政权。这个思想，对秦始皇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战国时期的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权的争夺上，也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各个政治集团的人物都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儒法斗争就是“百家争鸣”中的主要两家的斗争。儒法两家分别代表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韩非就是在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学说，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法治路线，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

在韩非以前，为法家初步建立思想体系的，是荀况。韩

非的思想就是在荀况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韩非所处的那个时代，儒法两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如果没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就不能战胜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新兴地主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即使夺得了政权，也不能巩固。因此，怎样总结和发展前期法家和荀况的思想，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这个担子落在韩非的肩上了。

荀况早期是儒家，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下，他转变了立场，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正当儒家妄图用唯心论的“天命”观挽救奴隶制度灭亡的时候，荀况提出了反“天命”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写了一篇反潮流的著作——《天论》。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说，自然的变化和社会政治没有关系。这是对儒家“天命”观的致命打击。荀况还进一步指出：天变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怕；人定胜天。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韩非在荀况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提出了“当今争于气力”的主张，认为新兴地主阶级只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就可以富强起来，战胜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这个主张显然有掩盖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因为地主阶级要富强起来，只能靠剥削和压迫农民。但在当时，这却是对孔孟之流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的有力批判，也是对荀况人定胜天思想的发展。这个观点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法家思想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为社会历史是向前发

展的，他们主张厚今薄古，主张革新。商鞅在驳斥儒家所谓“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时，主张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个方法，只要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就不一定照古代那一套去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鞅还认为，不照老办法办事未必是错的，按照礼制办事也不见得对。（“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这是对儒家“信而好古”、“克己复礼”的批判。荀况针对孟轲“法先王”的倒退思想，提出了“法后王”的前进主张。这些主张是当时变法实践的理论根据。但是，商鞅和荀况宣传这个主张的时候，没有能提出充分的论据来。韩非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出发，说明了历史上人同自然斗争、以及人和人斗争的事实，坚决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历史是前进的，现代比古代进步。时代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不期修古”，就是不期望学习古代的方法；“不法常可”，就是要打破常规，就是说怎么对新兴地主阶级有利，就怎么办。这就不仅仅是“法后王”了。韩非辛辣地讽刺那些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人都是些“守株待兔”的蠢人。韩非的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反映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敢于打破旧传统、急于变革现实的要求。韩非的思想比前期法家和荀况更进一步，反映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夺取政权、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更加坚决。

韩非还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了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商鞅在秦变法，使用了革命的暴力，取得了变法的成果。反动儒生赵良大骂商鞅，说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看出了儒家这一套的虚伪和反动，坚

持了变法，但他没有能够从理论上给儒家以有力的驳斥。荀况针对孟轲的“性善”说，提出了“性恶”的论点。尽管“性善”、“性恶”都是根据剥削阶级的利益提出来的论点，对人性都没有作阶级分析，但荀况的这个论点，却动摇了儒家道德观的基础。韩非在荀况的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提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道德观。韩非把儒家那一套“仁、义、惠、爱”等伦理观念统统都否定了。他说：一讲仁义，一说惠爱，就等于无功的人可以得赏，有罪的人反而逍遥。那么，谁还肯为国家拚死打仗（“当敌断首”）、努力生产（“力田疾作”）呢！韩非认为，奖励什么，惩罚什么，不可照儒家的那一套办，否则就不能推行法治。他举例说，楚国有个青年检举他父亲偷羊，这本来应该得赏，但楚国的官吏反而判他有罪，理由是他不孝。韩非说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再检举罪犯了。（“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又举例说，鲁国有个人从军打仗，打三仗当了三次逃兵。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家里有老父，怕战死了没人供养父亲。孔老二听了，认为这人孝顺，推举他做了官。韩非认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英勇杀敌了。（“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仁义道德有什么用呢？有了罪犯，没人检举；来了敌人，没人抵抗。因此，韩非认为仁义道德这一套东西是要不得的。

什么是韩非提倡的道德标准呢？就是努力生产，建立军功。总之，是恃“力”。这当然是露骨的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但在当时对于奴隶主阶级标榜的那一套“德”，却是有力的否定。

三

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变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更加完备的政治纲领。

第一，韩非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的主张（“要”就是大权）。这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是个很重要的政治口号。韩非认为，不根除分封制，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就不能打倒，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就不能巩固。

为了充分发挥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韩非第一次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主张。韩非认为，要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必须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治”；必须用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法令，来保证中央集权，这就是“法”。要做到这一点，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君还必须掌握实行法治的方法和手段，这就是“术”。光有“法”和“术”还不够，掌握最高权力的国君还必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能大权旁落，而要加强中央集权的权威，这就是“势”。“法、术、势”结合起来，当然有对付劳动人民的一面，但在当时实行这个主张就能更有效地防止奴隶主贵族混水摸鱼、破坏捣乱，及时地有力地镇压他们的复辟行动。

韩非的这个政治主张，是在总结了前代变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面临的加强专政、防止奴隶主复辟的迫切需要而提出来的。这是法治体制的新发展，使法治体制更完备、更周密、更有生气。

韩非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还制定了一条革新的

组织路线。他认为，对那些一不种田，二不当兵，吃饱了饭到处摇唇鼓舌的反动儒生，不能重用。为了避免那些游士说客结党营私，投机取巧，猎取高官厚禄，就一定要防止奴隶主贵族的代理人以各种面目混入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对于任用掌握国家大权的文武官员，要慎之又慎。宰相必须从地方官员提升，猛将必须从军队基层选拔。（“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是彻底摧毁奴隶主世袭制度，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统治机构的一条有效措施。

韩非还反对那种口头说得好听而没有实际能力的人当官。他认为，只要有富国强兵的能力，那怕出身低微，也应该重用；相反，那些不学无术的草包，即使名声再高，说得再漂亮，也不能重用。这条革新的组织路线，是实行新兴地主阶级革新的政治路线的具体保证。商鞅变法的时候，从地方政权到基层组织都有新的组织形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用人的路线，在人员安排上更没有从基层一直抓到上层。韩非在这方面的主张胜过商鞅，他特别注重将相的人选，这对于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防止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是很重要的。

第二，韩非发展了法家传统的“耕、战”政策。在他之前，李悝提出了“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吴起强调了“战（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商鞅把“耕、战”并举，而且行之有效。到了韩非的时候，法家的“耕、战”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事实证明，为了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必须加强“耕、战”，也就是说要富国强兵。

韩非从当时地主阶级的实际需要出发，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强农业生产，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确立下来，新兴地主

阶级的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在韩非的著作中，贯穿着强调“农战”的精神。他鲜明地提出“富国以农，距（拒）敌恃卒”的口号，指出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才能富强；而国家富强又得靠强大的武装来保卫。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思想，在《五蠹》篇中，公开申明要富国强兵，就必须铲除“奸民”。韩非把那些用“先王之道”骗人的儒生，靠耍嘴皮子吃饭、假公济私的纵横家（即政客），冒犯国家禁令的游侠刺客，不生产、不服兵役的游手好闲之徒，以及投机营利的奸商，斥为“五蠹”。这五种“蛀虫”，都是社会上依附于奴隶主贵族的残渣余孽，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障碍。韩非把李悝、吴起和商鞅关于“耕、战”的主张，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制定了一项重要的政策。

第三，韩非发挥了商鞅、荀况的见解，主张新兴地主阶级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贵族实行革命的专政。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儒家是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为了颠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鼓吹今不如昔的复古倒退思想，主张恢复殷、周时期的奴隶主专政。韩非接受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新兴地主阶级不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自己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就随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他对于当时不利于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各种思想都进行了批判。在《五蠹》、《显学》等篇中，对于儒家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同时他还提出：用“以法为教”代替奴隶主贵族的“先王之语”和“书简之文”；用“以吏

为师”来代替儒家的“私学”。这实际上是要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和思想、文化，战胜奴隶主贵族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

总之，韩非对于先秦法家的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于孔孟之道，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判。在这样的总结和批判中，形成了一条更加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和路线。如果说，在这以前，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理论还比较简单，那么经过韩非的改造和发展，就更加完善、更加精密了。秦始皇基本上按照韩非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在李斯等人的协助下，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四

在战国末期，全部摧毁有利于奴隶主阶级复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发展的趋势。韩非的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韩非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的经验。在两个阶级复辟与反复辟的搏斗中，韩非比前期法家更清醒地看到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性。这是他能够比前人提出更为完整的法家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韩非这个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早已形成。法家在同儒家的理论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思想体系。这是韩非能够比前人提出更加完整的法家思想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韩非的思想代表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在当时确实生气勃勃、起了革命的作用，并且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成为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的精神武器。对

此，我们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但是，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韩非不可能认识这样一个真理：原始社会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古代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奴隶的不断起义，动摇了奴隶社会的基础，封建制度才能代替奴隶制度。在这个条件下，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也起了进步作用。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便提出了在当时是进步的理论。当然，也应该看到，韩非终究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除了有代表进步力量、批判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思想——儒家思想的一面外，还有轻视和诬蔑劳动人民的一面。他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

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认识到：孔老二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反动顽固派的传统观念，历史上一切搞复辟倒退的腐朽势力都尊儒反法，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尊儒反法。为了反修防修，我们必须彻底地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一些法家的著作，深入和广泛地对儒家的思想开展批判。弄清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规律，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夺取批林批孔运动的更大胜利。

（原载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作者 =

页数 = 89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前言	
目录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 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	五厂工人理
论小组	
“复礼”和“明法” & 谢卓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 唐晓文	
谈吴起的变法事业 & 胡井武	
论商鞅的历史功绩 & 陕西师范大学	师之
荀孟之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 吉林大学	劲云戈
孟轲——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 & 田力	
韩非的思想是战国末期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	
论小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